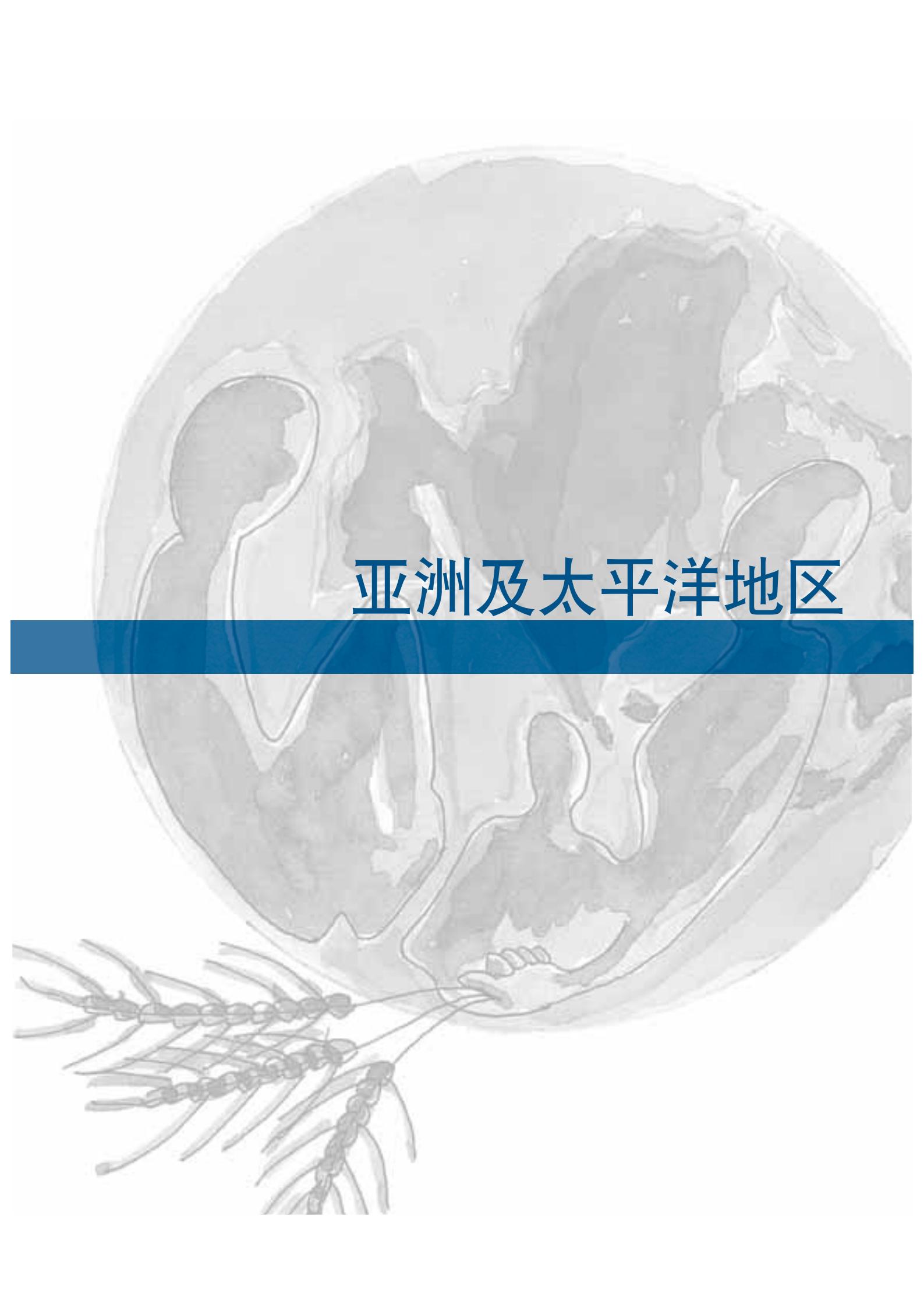




破土:

农业中妇女的现状及前景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现状与前景³



Suva市场上的妇女商贩
P. Beblen-Dexter, 1998.

尽管经济增长和人文进一步发展，但21世纪亚太地区仍然面临粮食安全的严峻挑战。特别是粮食的供应、获取和稳定性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此外，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环境退化和正在出现的地区趋势提出这样的问题，“世界（包括亚太地区）能否以合理的成本生产足够的粮食，向贫困人口提供获取粮食的机会同时在此过程中不破坏环境？”(Falcon, 1996)。

众所周知，在亚太地区，农村妇女在确保粮食安全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是通过她们在正常时期和困难时期为家庭成员生产粮食和提供获取粮食及营养安全食品的经济手段等活动而实现的。

尽管她们开展这些活动，但她们的作用总体上受到限制，被低估(Laier, Davies 等。 1996)。在发挥作用过程中，她们通常面临巨大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制约(Quisumbing, Brown 等， 1995)。

³ 本文基于Ravathi Balakrishnan博士的工作以及Peggy Fairbairn-Dunlop博士有关太平洋群岛的研究资料，Marlynne Hopper和Panpat Plungricharoen女士提供了研究和编辑支持。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第二章

就当地而言，粮食安全取决于个人和家庭在整个生命周期和季节生产、购买及使用足够数量和质量粮食的能力。了解家庭对控制资源获取和促进粮食安全的不同策略对了解妇女及男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及不同作用至关重要。亚洲的大多数农户和社区根据对劳动明确的性别分工管理其农村生产系统。这影响到粮食安全的实现。

亚洲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对农村妇女生产作用的认识和了解，这是历史上对妇女贡献低估的结果。这也导致了对妇女在获得教育和健康资源及机会方面持久的歧视。在太平洋岛屿，当地半自给和社区性质的经济传统上构成了家庭粮食安全的基础，从而保证了家庭所需粮食和基本用品的生产。在这种经济中妇女和女童对家庭生产和资源管理系统发挥不可或缺。

直到今天，发展和学术界很少注意到农村妇女的状况，Sachs提到“女权主义理论家以及农村社会理论家，仍然没有注意到农村妇女的关切。他们注重城市的理论工作而没有对农村妇女生活的背景进行足够的研究”(Sachs, 1996)。鉴于妇女在实现家庭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在2020年满足世界粮食需要将日益依赖妇女的能力及其资源(Brown, Feldstein, Haddad, Pena, Quisumbing, 1995)。在这种背景下，必须对亚太地区农村妇女进行一项研究，以便识别能够将性别问题纳入农业和农村发展所有方面的机会。

可持续粮食安全只有妇女作为平等的伙伴全面参与才能够实现。因此，必须了解她们在家庭、社区及当地经济中的作用和责任，以及她们日常面临的各种制约因素和不平等待遇。然而，一个关键的制约因素是没有按性别分列的数据。这些数据涉及到城乡和性别差别，妇女在农业中的多重角色（在家庭、社区和国家一级），及影响她们参与的因素。由于相关数据匮乏，以下介绍和分析很大程度上借助于现有宏观数据和当地案例研究。

差异与困境



印度北部一位妇女正在从村庄机井里抽取饮用水。照片背景是一个公共厕所。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直接向其农村社区提供自来水

J. Isaac, 1986.

亚太地区各国互不相同，在地理、文化、宗教和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广泛的差异。该地区包括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和若干个最小的国家。它不仅包括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同时包括一些经济规模最小的国家；一些国家正处在经济发展的巅峰状态，而其它一些国家仍为游牧或农业经济(ADB, 2001)。东亚、南亚和太平洋及大洋洲国家之间在宗教、文化和传统上存在明显差异，包括歧视和肯定方式的性别偏见。种族多样化及语言差别会造成文化独特性，并以新的方式影响政治和国内冲突，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国家间的这些差异。

南太平洋中的二十多个岛国在幅员、与外界隔离程度、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基里巴斯、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图瓦卢和瓦努阿图是最不发达国家）和文化背景方面具有显著差异。所有这些国家都面临偏远、国土小而分散等地理劣势；同时，实现规模经济的机会很少。纵观太平洋岛国，农业一直是维持生计的主要来源，半自给性农作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人口螺旋式的增长和加速向城市转移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生产上，有可能打破以家庭为基础的半自给系统所维系的良好平衡。因此，粮食安全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发展问题。

过去二十年，前所未有的经济和农业增长使亚太地区发生了变化。许多地方伴随这一转变的是引人注目的社会效益和生活条件的改善。除了良性的经济效果之外，人口压力下降在社会转型

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存在这些引人注目的效益，但在经济繁荣程度和粮食安全方面，国家之间、国家内部以及农村与城市之间，持续存在极端不平衡的状况。

最初对全球化极度高涨的热情，后来被内部脆弱性的现实，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时缺乏保护工作阶层及农村贫困人口的安全网所平抑。尽管最近出现危机，但人们意识到全球化无法回避，必须进行有效地管理，以便惠及更多的人口，而非使少数人致富。目前的现实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 正式和非正式继续对亚太地区的家庭粮食安全产生影响。

一个家庭是否能够获取“食物篮”商品取决于超出他们当地生产系统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例如，劳动力迁移和海外汇款，对亚洲许多农村社区的家庭粮食安全有很大影响。同样，援助和汇款在南太平洋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一些太平洋岛国是世界上人均受援量最高的国家。许多情况下，汇款超过出口收入。

在整个亚太地区，伴随经济转型而来的是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相对比例不断下降。这种下降在一些国家十分明显。例如，在泰国，农业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从1980年的23.2% 降至2000年的9.1%；如表2.1所示，情况并不均衡。尽管在整个亚太地区，农业在经济中的相对份额有所降低，但农业仍然对许多国家的经济，从而对的粮食安全和脱贫作出重要贡献。2000年，缅甸的GDP中有59.9%来自农业。在不丹、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蒙古、尼泊尔和乌兹别克斯坦，各自的GDP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来自农业。在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汤加和越南农业在GDP中的份额达到四分之一或更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印度该地区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GDP中有很大一部分仍然来自农业，农业所占比例分别为15.9%和25.3%。



正在浇社区菜园的妇女。
家庭和社区菜园所种植的
优质蔬菜，一旦按当地口
味适当备制，将长期解决
越南农村维生素A不足的
问题。

Peyton Johnson, 1992.



差异与困境

在保健领域，艾滋病毒/艾滋病在亚洲许多地区蔓延，提醒人们必须采取行动，而不是采取传统上的沉默与否认态度。同时，南亚地区妇女和儿童的营养不足也是一种正在酝酿中的重大危机。大多数严重依赖农业的国家也是低收入缺粮国 (LIFDCs)。反常的似乎是依赖农业的国家在改善粮食安全方面也滞后。这些数据表明，在高度依赖农业部门的国家，农村人口，包括妇女，可能面临粮食不安全和低收入的风险最高。

以降低对农业的依赖为特征的经济转型，对农村妇女在经济中的作用和粮食安全有若干影响。首先，国民经济体制和农业部门中的根本性变化导致了谋生机会的丧失。第二，满足家庭粮食需要的自给型粮食生产可能无法持续，家庭日益依靠现金收入来获取粮食。第三，闲置的农村妇女需要在农村生产系统内找到其它可行的生计手段，为其劳动提供经济报酬。最后，随着农业生产在全球经济联系增加时竞争更加激烈，技能有限、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妇女在经济易受害方面



农村儿童。
G. Bizzarri, 1996

面临更大的风险。

亚太地区的发展集中注意快速增长的城市，而近来的报告估计，亚洲农村人口数量不大可能降低。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到2020年亚洲农村人口可能为22亿。这些农村人口获取保健和教育的机会将减少，总体福利水平将下降 (ADB, 2000)。农村地区的老龄化和性别平衡变化因男人及青年为寻找更好的机会而被吸引到城市而加剧，有可能进一步使农村人口模式复杂化。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第二章

表 2.1
亚太地区部分国家农业对GDP的贡献(百分比)

亚洲地区	低收入缺粮国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孟加拉国	是	41.2	29.4	24.6
不丹	是	56.7	43.2	332
柬埔寨	是	...	56.6	37.1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	30.1	27	15.9
印度	是	38.1	31	25.3
印度尼西亚	是	24.8	19.4	16.9
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	是	26.0	41.8	8.6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是
大韩民国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	是	...	61.2	53.2
马来西亚			15.2	8.6
蒙古	是	13.6	15.2	33.4
马尔代夫	是	9.5
缅甸		46.5	57.3	59.9
尼泊尔	是	61.8	51.6	39.8
巴基斯坦	是	29.6	26	26.3
菲律宾	是	25.1	21.9	15.9
斯里兰卡	是	26.2	22.9	19.4
塔吉克斯坦	是	...	27.1	27.4
泰国		23.2	12.5	9.1
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	是	...	33.1	34.9
越南		50	38.7	24.3
西南太平洋地区	低收入缺粮国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Southwest Pacific				
库克群岛		...	21.2	16.6
斐济岛		22.1	...	18.4
基里巴斯	是	31.5	18.6	...
马绍尔群岛		...	13.9	13.5
巴布亚新几内亚	是	33.1	29	28.7
所罗门群岛		22.1
汤加		38.5	35.1	285
瓦努阿图	是	...	20.7	15.8
西萨摩亚	是	16.2

资料来源: 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关键指标》
(表13: GDP部门份额), 2001. FAO, 低收入缺粮国: <http://apps.fao.org/notes/876-e.htm>



差异与困境

本地区发展不均衡主要以农村地区为代价使继续从事家庭农场和自给农业生产，以及在出口型农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多数农村男人和妇女所面临的困难加重。尽管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部分农村地区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技术和经济转变，伴随而来的经济增长却没有使多数农村居民的福利增加。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普遍缺乏支持机构，尤其是保健和教育服务，以及对农村基础措施的改善重视不够。同时，在农业和农村发展部门改革战略及预算分配方面普遍忽视妇女对农村生产及粮食安全的重要贡献。

平等面临的挑战

整个亚太地区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有很大的差距，反映出国与国之间和各国内部在经济和人力开发指标方面所存在巨大的多样性。在该地区复杂的资源环境中，以及在有关用粮食贸易还是自给来加强粮食安全的争论中，性别平等存在巨大的差距，正如表2.2中的人力和性别开发指标排序所显示的那样。尤其是，主要为低收入缺粮国的南亚国家（如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以其在人力和性别相关的发展指标方面的表现不佳而著称。如预料的那样，处于发展进程另一端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新西兰，则在这些指标上得分很高。

而且，亚洲各国大量城市妇女取得的进步，掩盖了该大陆许多地区，特别是南亚农村妇女中的低人力开发指标和极度性别不平等状况。农村妇女继续在经济生产和家务劳动的双重责任中挣扎。多数妇女面对贫困、文盲、高健康风险、获得的生产资源不足，无法进入有利可图的粮食市场。有人认为，“对许多人而言，身为女性和生活在亚洲农村地区是一种双重歧视”(Bloom, Craig 等, 2001)。

总体而言，亚洲农村妇女的状况更多是由习惯法和社会禁令造成的，而不是因赞同全球平等规范造成的。东亚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相对成就，尤其与南亚比较，可以归功于由政治观念、民族文化和教育成就所培养的有关平等的社会规范。然而，东亚妇女在公共领域的可见性往往掩盖了她们在努力为家庭提供所需方面隐藏的不平等。



平等面临的挑战



正在去进行补充授粉工作的稻作妇女。

G. Bizzarri, 1996.

虽然多数太平洋岛国（如库克群岛、斐济和帕劳）在人力开发指数方面取得长足进展，但另一些国家，如基里巴斯、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则落在后面。太平洋岛国的性别平等，即妇女与男人之间的差别，一般不如亚洲明显；因为太平洋岛国的性别关系复杂；然而，在将指标普遍化时，应该慎重。值得指出的是，在一些太平洋岛国，妇女人力开发指数的分数总体上超过男人（如在性别比例一栏中分数超过100）。

亚洲与太平洋岛国妇女之间的这种差

异可能与太平洋岛国农村和城市社区比在亚洲整齐一致有关。一般而言，太平洋岛国的城市和农村妇女拥有相似的就业机会和选择。此外，在太平洋国家，如斐济、新喀里多尼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正在开发的大型城市，出现了将城镇人口与仍留在农村中的人口联系起来的网络。

亚太地区许多国家对农业部门的忽视，使农业成为拥有其它更加有利可图选择的男人和妇女的最后一一种选择。因此，那些选择机会少的人，一般是贫困、不识字的农村妇女，被迫在农业部门承担主要角色，从而导致了“农业生产的女性化”。由于有能力的男人和妇女因受诱惑而离开了农业，加剧了这种趋势，孟加拉国、中国和印度为创造就业机会，发展了小规模农村工业、小型企业和乡镇企业。同时，内部迁移已经成为一种引力，吸引青年人到城市去寻找更多的获利机会。使上年纪的人，尤其是老年妇女成为主要农民。这就造成了在中国出现的“灰色农业”。总而言之，亚洲妇女的状况可以称为具有“双重性”。其特点是在新的繁荣与持久赤贫所形成的二元经济背景下，性别平等的进步与差距共存。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第二章

表 2.2
亚太地区部分国家ⁱ

亚洲	人力开发 指数 ⁱⁱ : 排序	与性别有 指数 ⁱⁱⁱ : 排序
孟加拉国*	低	121
不丹	低	...
柬埔寨*	中	109
中国	中	76
印度*	中	105
印度尼西亚*	中	92
日本	高	11
哈萨克斯坦	中	...
韩国	高	29
老挝*	低	119
马来西亚	中	55
马尔代夫	中	69
蒙古*	中	104
缅甸*	中	107
尼泊尔*	低	120
巴基斯坦*	低	117
菲律宾	中	62
斯里兰卡	中	70
塔吉克斯坦*	中	93
泰国	中	58
乌兹别克斯坦	中	86
越南	中	89
西南太平洋地区		
澳大利亚	高	2
斐济	中	63
新西兰	高	17
巴布亚新几内亚*	中	110
(西)所罗门	中	
瓦努阿图	中	

* 低 GDI

ⁱ 朝鲜、库克群岛、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瑙鲁、纽埃、帕劳、所罗门群岛、汤加和图瓦卢的HDI和GDI不详。

ⁱⁱ 人力开发指数(HDI)用于衡量三个基本方面的平均成就: a) 长寿而健康的生命(用预期寿命来衡量); b) 知识(用成人识字率和总的小学、中学和高中入学率来衡量); c) 适度的生活标准, 用人均GDP来衡量(购买力折算为美元)。

ⁱⁱⁱ 与性别有关的开发指数(GDI)用HDI衡量的平均成绩进行调整, 以反映同一地区男女不平等的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力开发报告》, 2001, 212-213 页, 241-242页。



平等面临的挑战

对整个亚太地区妇女的宏观分析表明了妇女在经济成就、政治参与、教育进步和社会表达方面的差距为特征的多样性景象。这种区域多样性和普遍存在的城乡二元化反映了各国在促进妇女进步方面的重点，以及在支持发展中的性别平等干预措施方面的不同资源承诺。总体而言，该地区在

- 使农业和农村社区中妇女在性别平等上取得与城市地区相同的成就；
- 在农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正在下降的背景中，为农村妇女创造机会，使其成为消除贫困，保证粮食安全的主力军；
- 在现有的家庭内部经济和社会现实的联系中，实现家庭粮食安全和性别平等；
-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和农业部门商业化的背景下，防止农村妇女的
- 赋予农村妇女在一个由农业和信息新技术塑造的复杂世界上有效发挥作用的能力。

农业中妇女

在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妇女是农业劳动力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目前还没有系统的关于妇女作用和贡献的相关数据。该地区的微观性别研究增加是一种积极的发展态势，弥补了现有宏观数据的不足。对生产体系的重新重视，引出了一些对特定农业地区或地点中性别作用的研究。参与性农村评估的大量增加，提供了农村妇女对当地生产贡献的定性数据。然而，这些研究是各自独立进行，研究人员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各不相同。结果是这些研究在质量、可靠性和准确性方面存在差异，因此难以将地方结果普遍外推到更广的国家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本节将根据妇女参与粮食和农业部门中各类生产工作的现有案例研究，综合介绍妇女在农业劳动力及农业部门参与情况的现有汇总数据。

表2.3中的宏观数据表明了亚太地区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情况，以及男女劳动力参与农业的相对比例。该数据表明，在南亚国家，如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高达60%到98%的妇女在农业部门就业。事实上，在以上每一个国家，从事农业的妇女人数超过男人。

在东南亚国家，如柬埔寨、中国、老挝、缅甸和越南，妇女对农业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例如，在经济活动人口中，柬埔寨78%的妇女参与农业，在老挝该则为81%。事实上，数据表明，在多数亚洲国家，从事农业的妇女在经济活动人口中的比例比男人的比例更大。考虑到这样一种事实，即表2.3中从事农业的经济活动人口的数据不包括农村妇女的无偿生产和家务劳动，此结论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理由相信，在亚太地区，妇女对农业劳动力的贡献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反映在这些统计量中。如果将无偿劳动包括在内，女性劳动力在农业中就业的数字将更大。

尽管太平洋岛国妇女在服务业中就业的比例高于农业，但表2.3表明太平洋地区仍然有大量妇女从事各种各样的农业活动。



农业中妇女

该比例在不同国家不等，低的为1%到3%，如基里巴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马绍尔群岛（该国可耕地严重短缺）等环礁国家。高的为瓦努阿图的80%，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84%。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农业中就业的妇女比例超过男人（UNDP, 1999）。尽管表2.3中的数据显示在太平洋地区，作为经济活动人口的一部分，妇女从事农业的比例存在显著差异，但现有一些其它研究表明，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妇女和女童在家庭生产和资源管理系统中发挥不可或缺。

此外，由于数据采集中使用不同的定义和时期，加上数据普遍匮乏，因此很难将妇女对农业劳动力的贡献普遍化。另外，一些太平洋岛国，如在文化传统上将农业视为男人工作的汤加，性别角色也不鼓励妇女正式参与农业。

即使存在数据不足的制约，但明显可以看出，除了个别例外，妇女在亚太地区是劳动中的主力军，并对农业部门作出实质性贡献。数据显示，在人力开发和性别领域取得较少或中等成绩的国家，往往是低收入缺粮国，这些国家有更多妇女从事农业。一般而言，这些发现和观察支持这样一种意见，即农业生产女性化正在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出现。

表2.3也列出了女性成人识字率。并列出了女性识字率的百分比，以突出性别差异。鉴于所介绍的识字率数据并没有按居住地区分，（城市与农村），有理由假设，农村妇女中的成人识字率甚至更低。例如，在孟加拉国，农村妇女中的成人识字率仅为36.2%，而城市妇女和男人的识字率则分别达到56.1%和75.4%（Pal, 2001）。

表2.3提供了有关成人识字率的性别比例，说明了太平洋地区妇女受教育的状况。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数据这些国家中的女性成人识字率特别低证实，妇女受教育的机会长期比男人少（UNDP, 1999）。识字率低妨碍妇女获取信息和技术，影响到她们在家庭、社区和国家一级参与决策的能力，从而影响她们改变现状的能力。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识字率低与妇女参与农业比例高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

除了发达国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如马尔代夫、马来西亚和部分太平洋岛国以外，该分析表明，绝大多数农村妇女在识字率方面远远落后于男人。尤其是在孟加拉国、印度、老挝、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农村妇女成人识字率特别低。在农业生产女性化的背景下，在提高女性识字率方面没有取得进展。这将对该地区未来的农业部门和粮食安全产生严重影响，因为它们将依赖只有很少或者没有正规教育的女性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很低的农村妇女更有可能受到经济结构变化的不利影响，在面向竞争性全球市场的农业部门尤其如此，同时她们不大可能积极地应对。这些农村女性在识字率方面的不足，再加上农业生产的女性化，意味着必须提高农村妇女的技能和知识，从而能够赋予她们技术和经济能力，并为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



一群正在缝纫机旁制作服装的妇女。
缝制工业是联合国
贷款所扶持的乡村
项目之一。

农村妇女的工作

在整个亚太地区，**农村妇女**对家庭生产和粮食安全的贡献至关重要。虽然在各国之间这种贡献的具体性质不尽相同，但很明显，大多数农村妇女所承担的家庭劳动份额不断增加，她们的生活日益单调繁重。该地区各国进行的各种研究提供了关于性别角色的重要结论，为提高农村家庭生产力的政策和干预措施提供了依据。但是，目前尚未对这些研究结果进行系统的综合，这有碍真实了解农村妇女在家庭粮食安全中角色的努力。尽管从这些

农业中妇女

表 2.3
亚太地区部分国家在教育和经济活动方面的性别情况

低收入缺 乏亚	成年女性识字率 (15岁和15岁以上) 比率 (%) 1999	妇女参加经济活动比率 (15岁和15岁以上) 比率 (%) 1999		农业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的 百分比	
		占男人比率的 百分比 (%) 1999	占男人比率的 百分比 (%) 1999	女性 1990-99	男性 1990-99
孟加拉国	是	29.3	57	65.8	76
不丹	是	58.0	65
柬埔寨	是	81.5	96
中国	是	75.5	83	73.0	86
印度	是	44.5	66	42.0	50
印度尼西亚	是	81.3	89	55.0	67
日本		51.1	67
哈萨克斯坦	是	60.6	...
韩国		96.2	97	53.0	63
老挝	是	31.7	50	74.6	84
马来西亚Maldives		82.8	91	47.9	60
马尔代夫	是	96.2	100	65.9	79
蒙古	是	52.1	72	73.2	87
缅甸		80.1	90	65.8	75
尼泊尔	是	22.8	39	56.9	67
巴基斯坦	是	30.0	51	35.0	41
菲律宾	是	94.9	100	49.4	61
斯里兰卡	是	88.6	94	42.4	55
塔吉克斯坦	是	98.7	99	57.1	...
泰国		93.5	96	72.9	84
乌兹别克斯坦	是	84.0	90	62.0	...
越南		91.0	95	73.5	90
西南太平洋地区					
澳大利亚		55.6	76
库克群岛		6
斐济		90.5	96	35.4	44
基里巴斯	是	1
马绍尔群岛		3
新西兰		56.9	78
巴布亚新几内亚 Western Samoa	是	56.0	78	67.0	78
西萨摩亚	是	78.8	97	...	67
所罗门群岛		85
图瓦	是	34
瓦努阿图	是	80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第二章

第2、3栏：由于列出的所有国家的其它数据不详，因此利用成人识字率作为女性教育成就的指标。

第4、5栏：根据国际劳工组织（1996）的经济活动人口和总人口数据计算。由于四舍五入和省略了未归类的活动，因此按经济活动列出的就业百分比可能不等于100。关于数据的具体说明见 ILO (1996 and 1999)。

第6、7栏：u 表示使用 UNDP 数据。a 表示使用 ADB 数据。参阅1990 或最近年份。库克群岛、斐济、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瑙鲁、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图瓦卢和瓦努阿图的数字系指过去15年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第1栏：FAO LIFDC 数据；第2 和 3栏：UNDP 《人力开发报告》(HDR) 2001, 表 23；第4 和5栏：UNDP HDR 2001, 表24；第6 和7栏：UNDP HDR 2001 表24 和亚洲开发银行，2002。《亚洲和太平洋发展中国家的关键指标》：表5 和表7。



农业中妇女



妇女在属于海得拉巴水稻研究董事会的试验地里移栽水稻。
G. Bizzarri, 1996.

研究中可以看出关于性别角色的一般情况，即在亚太地区农村男人和妇女都对生产做出贡献。但是，性别角色有可能因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农业生态和生产系统，种植作物、畜牧业与渔业生产的关系，家庭成员的非农业就业机会的不同而有差异。

采用的方法是综合各种来源的现有资料，建立理论观点，表明农村妇女贡献的多样化，持续性的单一劳动，以及她们在家庭和社区内部获取资源方面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农村妇女在家庭生产中的作用涉及农业生产，家庭劳动，非农业生产和社区劳动。她们对劳动、管理和当地及传统知识和专业技能都有所贡献。图2.1指出了影响妇女作用和责任，以及支配她们获取粮食和资源的社区及家庭因素。

农村妇女的工作和她们对经济及社会的贡献可分为两大类，即在社区中的贡献和在家庭中的贡献。在大多数国家，农村妇女对社区生产做出了积极贡献。

这种贡献改进了社会联系、亲友关系，并有助于在困难时期交换资源。在家庭关系中，性别角色的观念是传统上形成的，并建立在文化和宗教信念之上。这些信念决定了农村妇女如何参加家庭生产。

妇女对家庭的贡献正日益受到家庭外部变化的影响。例如，当家庭外部新的经济机会鼓励农村妇女跨越现有性别角色的界限，去从事家庭之外的经济活动时，农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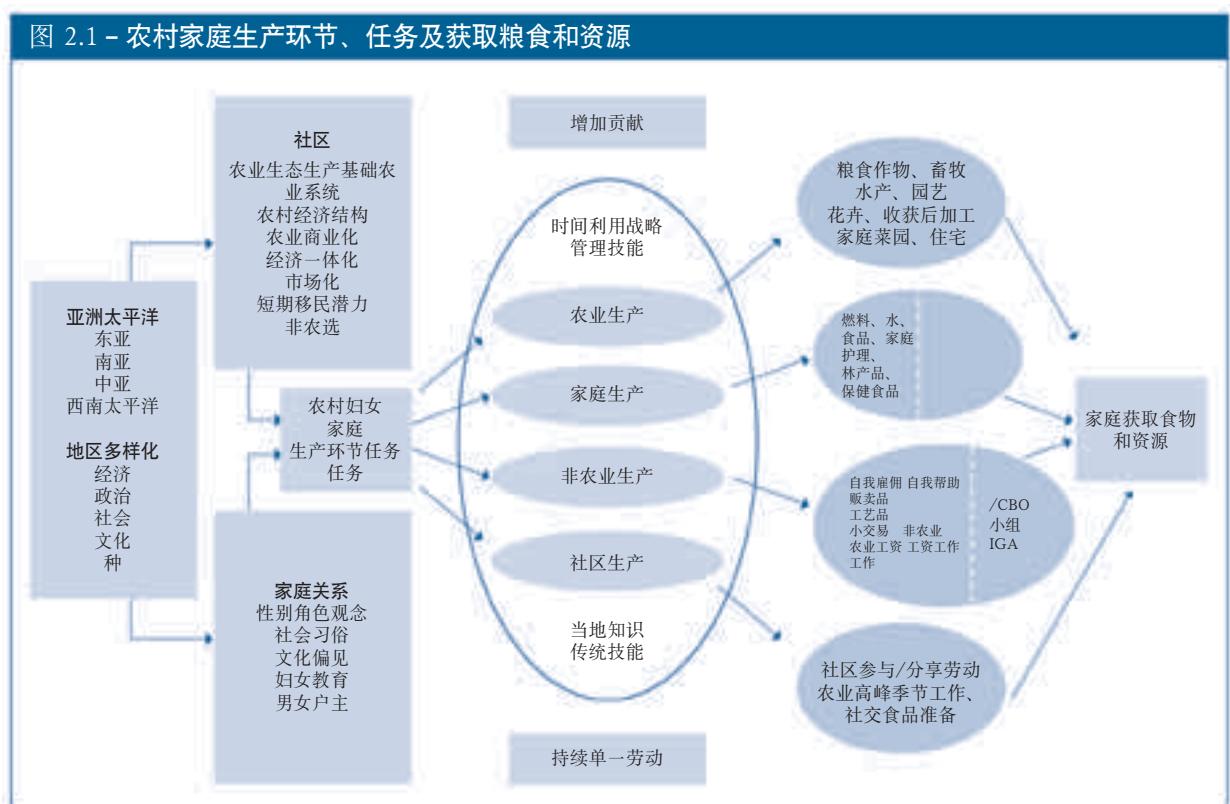
母亲给她的小孩在路边冲澡。
Asupi, 1993.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第二章

贫困起到了一种外推的作用。例如，最近农村多样化方面的发展，伴随着商业化和市场趋势，为非农业有偿劳动创造了机会。甚至教育水平低、缺乏培训和社会流动性，也妨碍了许多地方的农村妇女对这些机会做出反应。尽管经济因素诱发了短期的内部迁移，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为农村妇女创造了新的工作模式，但家庭生产中的性别角色仍然固定不变，家庭内部的工作通常被视为妇女的工作。

图 2.1 - 农村家庭生产环节、任务及获取粮食和资源



资料来源：选自 FAO, 2000,
Balakrishnan; R. “支持农村妇
女的技术开发与技术转让方面
的差距扩大”，《人力资源，
农业和农村发展》，第89页。

增加经

在亚太地区, 农村妇女工作的特点是变化、连续性、灵活性和僵化性 (Gurung, 1999)。为确保家庭获取食物和资源, 妇女在农业、非农业以及社区中的新的生产角色具有变化和灵活性, 以保证连续性和僵化性与确定性别角色的规范相关, 规定农村妇女和女童应该负责农村家庭中的家庭生产。家庭内部关于劳动分配的决定往往存在偏见, 将家庭劳动指派给妇女和女童。面对经济压力, 性别角色有可能变得灵活, 使妇女能够从事在传统上被视为男人的工作。同时, 性别角色的僵化性意味着男人不从事家务劳动。

南亚

在孟加拉国, 参与经济活动的情况因性别、活动类型和居住地点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农村妇女传统上在创收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如收获后工作, 喂牛和挤奶, 养羊, 后院养鸡, 养鱼, 农业, 园艺, 食品加工, 藤条和竹子编制, 纺线, 手工织布, 缝制衣服, 织鱼网, 绳子生产和手工艺品。大量农村妇女, 尤其是极端贫困的无土地家庭中的妇女从事建筑、土木和田间农业生产等活动。这些活动传统上属于男人。

在孟加拉国, 无偿的家庭劳力是农业中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其中, 妇女的比例很高 (Pal, 2001)。一项有关家庭内部稻米生产组织的研究 (基于较小的样本) 表明, 男性和女性家庭成员从事灌溉农业和灌溉管理的程度与家庭所拥有土地数量以及她们的宗教信仰有关。女性家庭成员在稻米生产中比男性家庭成员发挥更大的作用。这项研究指出了不同经济类型农户之间的差别。例如, 与边际农户相比, 中产阶级家庭中从事稻米生产的妇女比例更高(大多数从事移栽和作物加工工作)。在中层, 信印度教的男性户主家庭中妇女劳动占全部稻米生产劳动的54%, 而信穆斯林教的男性户主家庭中妇女劳动占31%。

如果比较任务分配, 则出现变化的模式。除了传统的作物加

工任务外，家庭中的妇女从事苗床、起苗和移栽、施肥、除草和收获等传统上属于男人的工作。大约40–50%的农田灌溉和非农用水管理也由妇女承担，与家庭男劳力的贡献几乎相同 (Jordans, Zwarteveen, 1997)。

在印度，根据国家样本调查机构的资料，农村妇女占全国参与工作人数的22%。但是，如图2.2所示，全国平均值掩盖了各邦之间的巨大地区差异，因为各邦之间在人口、农业-生态系统和生产的社会和经济组织方面存在差异。农业机械化水平有助于解释妇女参加农业劳动力方面的差异。例如，在旁遮普邦，绿色革命带来了繁荣，农业高度机械化，农村妇女参加劳动的比例最低。相比之下，安德拉邦主要靠妇女从事棉花、落花生等劳动密集性的作物生产。这些作物需要在干旱条件种植，该地农村妇女的参与程度最高。

在印度，社会习俗、传统和文化考虑都影响到男人和妇女从事的工作类型。国际农发基金1991年在中央邦的部落地区进行的一项研究注意到了男女分担家务和生产劳动的比例。研究结果表明，妇女和男人都在农业中劳动，在一年当中的几个月，共同采集和销售非木材林产品并且从事带薪劳动。但是，这种工作活动上的平等并没有在由男人主宰的收入分配决策过程中得到反映 (IFAD 1997)。另一项研究覆盖了印度三个生态上不同的脆弱地区。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农业是一个家庭企业，但社会规范则将劳动按性别和年龄划分。总体上，整地和犁地被视为男人的责任，移栽和除草则被视为妇女的工作，而收获和收获后工作由妇女和男人共同承担。在某些地区，在大量需要劳动力的时期，妇女承担部分较繁重的、传统上由男人承担的工作，如整地。以Kolli山丘地区小米的耕作为例，妇女承担了大部分农田活动和收获后工作，包括种子储藏，供应和交换 (Rengalakshmi 等,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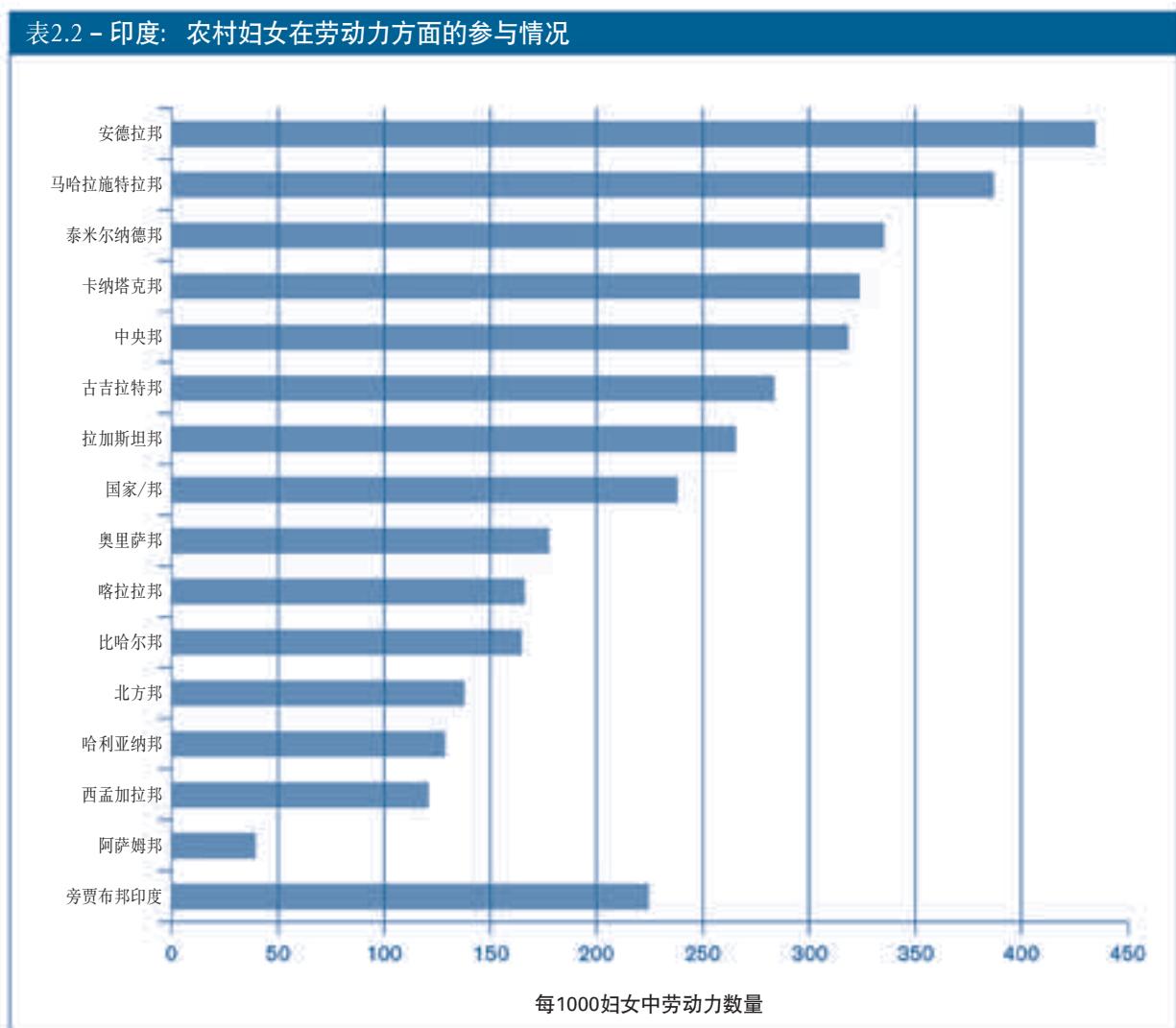
在马尔代夫，社会经济变革强化了不同工作在性别之间的隔离，加剧了不平等情况。传统上，男人从事渔业，妇女从事小规模的鱼类加工。在斯里兰卡等国视为美味而称作“马尔代夫鱼”的最终产品被广泛出口。在“马尔代夫鱼”成为该国主要出口

农业中妇女

商品时，妇女参与劳动力的比例超过50%，是发展中国家中最高的国家之一。自从那时起，捕鱼业的现代化为渔民创造了很多机会，使他们增加了捕捞量并直接向采集船只销售。这些采集船只将其冷冻或提供给灌装厂进一步加工。结果，妇女在鱼品加工方面的参与减少。参与率1985年降到21%，1996年降到19%（Dayal, 2001）。同时，妇女更多地在自家小块菜园从事自给性农业生产如管理和选种（Kanvinde, 1999）。

资料来源：Menon-Sen, Kumar, 2001.

表2.2 – 印度：农村妇女在劳动力方面的参与情况



在尼泊尔，大约40%妇女从事经济活动。大多数在农业中就业。她们多数以无偿家庭劳动力的形式，从事技术含量低、工作方式原始的自给农业生产。事实上，随着更多男人转移出农业生产，农业正逐渐女性化(Acharya, Acharya, Sharma, 1999)。除了基于文化原因的劳力分工之外，以下原因也造成了妇女工作负担加重：(1)地理和基础设施因素；(2)向外迁移；(3)通过开发项目促进新的活动 (IFAD 1997)。

传统农牧经济的显著变化和非农活动的增加，在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市场上创造了正式和非正式的就业机会。而产业市场又严重依赖低工资的女性劳动力。这是对基本生存需求和新的欲望混合在一起时作出的反应。与本村之外的世界更多的接触，产生了这种新的欲望。一项全国性的研究认定了农村家庭所采用的三项资源开发策略：家庭农业经济、本地市场经济和短期迁移。大约67%的妇女参与家庭农业经济，59%参与本地市场经济，75%短期迁移。应注意的是，妇女在农忙和农闲季节采用的策略有所不同 (Shrii Shakti 1995)。

在巴基斯坦，妇女是农业中的主力。从事作物、蔬菜和畜牧生产的妇女达到1200万人。棉花占全国出口收入的二分之一，主要依靠女性劳力。妇女专门负责棉花采摘，从而使她们面对大量使用农药引起的健康危害(Bari, 2000)。在巴基斯坦进行的一项性别研究发现了按性别和家庭地位作用分工的大量证据。其中，男人主要负责“市场”工作：种植、放牧和其它增加收入的活动，而妇女则负责家庭生产活动 (Fafchamps, Quisumbing, 1999)。

在斯里兰卡，殖民地时期的种植园为满足劳动力需求，招收了来自印度南部的妇女。这些妇女是该国最早挣工资的人。从那时起，妇女一直在农业中发挥重要作用。1997年，斯里兰卡大约有42%的劳动妇女从事农业Chena (砍伐和焚烧)、稻田和家庭菜园中的性别角色因生产过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男人主要从事整地、播种、施用化肥和杀虫剂以及销售，而妇女则从事移栽、收获后工作和在家庭加工自有菜园产品 (M.S. Swaminathan 研究基金会, 1999)。尽管妇女对该部门作出了贡献，但她们的作用

与男人的作用相比是次要的。因此，在斯里兰卡女性农民通常被视为农民的妻子，而不是自己拥有权利的经济生产者。在农村发展当地工业的失败，进一步限制了妇女获取非农就业的机会 (Jayaweera, 1999)。

东亚

在中国，农业生态特点及生计方式的差异导致了农村妇女状况的不同。经济增长步伐和迈向市场经济，对全国农村妇女的生活既有积极也有消极的影响。一些农村妇女因这些新的经济机遇而受益，而另一些妇女则面临新的挑战，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国际农发基金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的农村妇女花在再生产上的时间 (56.7%) 高于花在生产上的时间 (43.3%)。应该指出，在所研究的省份中，不同年龄和教育程度的妇女在时间使用上存在差异。50岁以上的妇女将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家务上，因为人们认为农田的体力劳动太繁重。中年妇女不仅在家庭发挥关键作用，而且和男人一起分担作物和畜牧业生产。在很多地区，凡有可能时，青年妇女往往喜欢农业之外的其它活动。该研究还认识到农村地区在时间使用上有季节性差异。例如，在农忙季节，妇女可能每天在田间工作8到10小时，而在农闲时间，则从事温室生产和其它创收活动 (IFAD 1995)。

在云南青山区进行的一项案例研究发现，妇女承担了80%的农业劳动，并参与除犁地以外的所有其它劳动（包括耕作和作物管理、收获及销售）。该研究再次显示，妇女参与农业活动是由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决定的。青年妇女和中年妇女负责大部分农业和林业活动，如收集薪柴，非木质产品，以及松叶用作厩肥。这些活动主要是在11月到1月的农闲季节进行。60岁以上妇女不参加农业生产，女童则帮助家务和照看弟妹。男童的活动不太规律 (Jieru, 1999)。

第三项研究是在中国另一省进行的。该项研究发现妇女没有被习惯性排除在非农就业机会之外，经济发展没有均衡地增加中国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研究指出，尽管男人比妇女更有可能受雇于非农工作，但当地和地区性商业发展造成男性工人的短缺，迫使雇主雇佣妇女。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的非农就业机会显著增加。该研究进一步指出，随着商业进一步发展，男性与女性非农业工人对家庭收入贡献的相对比重进一步缩小。与此同时，留下从事农业生产的妇女更有可能成为家长。这种地位给女性家庭成员带来更大的家庭决策权 (Matthews, Nee, 2000)。

在蒙古，游牧家庭在生产和再生产经济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家庭权力和责任按性别区分。以合作与专业化相结合为特点，传统的游牧活动在男人与妇女的工作之间仍有明显的差别。私有化模糊了男人和女性工作之间的区别，更多妇女和男童承担起传统上被视为男人的工作。私有化也为增加畜群数量，发展奶制品加工提供了机会。奶制品加工传统上是妇女的工作，进一步加大了妇女的工作量。虽然被视为妇女责任的有偿和无偿生产性工作量增加了，但仍然进行了少数传统的分工。因此，一些工作中存在灵活性，妇女和男孩承担起男人的工作；而另一些工作则继续存在僵化情况。尽管工作量增加，但妇女仍然继续独立承担属于她们的工作；总体上，妇女的工作量增加了 (UNIFEM 2001)。

东南亚

柬埔寨妇女在农业、林业和渔业中发挥主导作用。根据《柬埔寨人力开发报告》，妇女占农业、林业和渔业劳动力的55%，而男人仅占45% (柬埔寨王国政府，2000)。劳力的组织似乎围绕在家庭现有的交换和雇用劳力上。通过这种方式，男人和妇女分担许多农业生产活动，如担水、搬运柴薪、照看牲畜 (Gray, Wouters, 1999)。

在印度尼西亚，妇女是农村家庭的主力，为家庭和农业生产



农业中妇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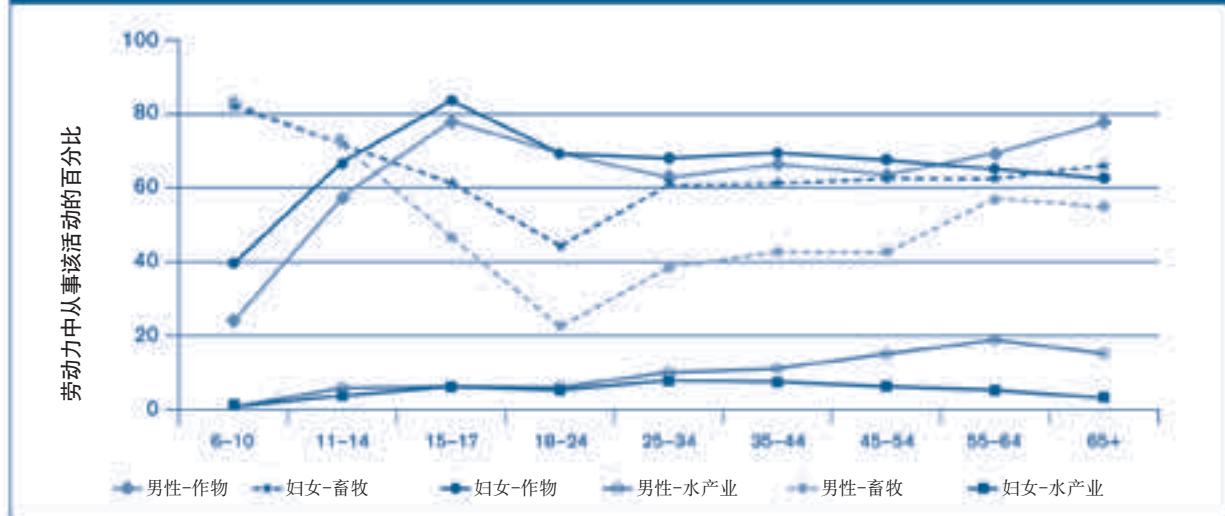
提供劳力。农业占农村就业的比率最高。每100名从事农业的男人，大约就有63名从事农业的妇女。因为大多数农村家庭拥有少量土地或者根本没有土地，农村妇女往往通过在中小企业中从事非农就业而补充家庭收入和粮食安全。一些企业与农业生产有联系 (Mugniesyah, 2002)。在老挝，研究表明，妇女和女童在家务劳动之外，还承担50%到70%的农业和其它生产活动。女性农民主要为家庭消费进行生产。通过她们的劳动，农村妇女可获得高达30%的家庭食物和所需用品(UNICEF, 1996)。性别角色和家庭女性成员参与有关农业和水产养殖的决策过程，因地区和种族而异 (Murray, Kesone, 1998)。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最成功地例子之一，过去15年的就业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马来西亚，混农林业、畜牧业和渔业过去曾是妇女就业的主要来源。1995年，这些部门仅雇佣了15.9%的女性和20.3%的男性工人。马来西亚妇女利用经济转型过程，转向收入相对较高的其它部门。今天，制造业是唯一雇佣妇女最多的部门，其次是社区、公共、社会服务、贸易和农业 (Ahmad 1998)。相比之下，菲律宾的大多数妇女1997年超过50%继续从事农业工作。妇女主宰农村非正式就业市场 (APEC 南北研究所, 1999);五个种稻村的数据表明，妇女在农业和非农工作中承担的工作与男人一样多 (Estudillo, Quisumbing 等, 2001)。

在泰国，妇女在农村生产和创收系统中扮演主要角色。1995年大约40%的妇女从事农业。在小农户中，所有成员不分年龄和性别，都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作用。然而，在较年长的年龄组 (3034, 3539和4049岁)，农村妇女参与劳动的比例最高，大约为80% (Thonguthai, Thomson, Bhonsung, 1998)。随着经济转型，农户以外的有薪就业机会和自我雇用机会增加，农村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情况开始类似于城市妇女。曼谷附近的一项研究证实了妇女在农产品销售方面的重要性。一项对10个农产品市场的调查表明，大约80%的蔬菜和水果摊属于妇女 (Korsieporn, 2000)。

在越南，最近的越南生活标准调查数据显示，妇女大量参与农业活动。如图2.3所示，数据表明农村妇女对畜牧业生产的贡献

图2.3
越南：劳动力参与作物生产、畜牧管理和水产养殖的情况



资料来源：Desai, 2001

超过了男人。在作物生产方面，两者贡献相同，调查数据进一步表明，在1992–1993年至1997–1998年五年间，在18至64岁年龄组中，男女成人有薪雇用的比例从26%增加到32%。而且，增加的大部分人是来自对农村地区的妇女，城市地区则无变化。最近的另一项研究也支持这些关于妇女对农村生产系统贡献的发现。并再次证实了妇女在牲畜饲养方面的主要作用。它发现妇女劳动平均占家庭全部劳动的69% (Desai, 2001)。

在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妇女通常在加工和销售鱼品中发挥重要作用。当然，在南亚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孟加拉国和印度，深闺制度和其它文化习俗传统上限制了妇女的活动，她们在鱼类捕捞方面的参与程度有限。在巴厘，妇女在鱼产品销售方面很活跃。而在南苏拉威西，男人则完全控制了该项活动 (Felsing, Brugere, Kusakabe, Kelkar, 2000)。

太平洋岛屿

在太平洋岛国，农业生产单位以小农户为主，其产品供家庭消费，在国内及出口市场上交换和销售。传统上，妇女和女童承担粮食生产和家庭粮食安全的主要责任。她们在家庭园地上种植作物，饲养小家畜，制作手工艺品，并从事其它增值的活动，如制作干椰肉、晒鱼、织布、生产椰子油、备制传统药材、种植材料和种子。而男人则从事经济作物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种植经济作物因其经济价值和对国家发展的贡献而变得更加重要，妇女所从事的各类农业活动仍然与粮食安全有关，在日渐崛起的经济模式中人们认为这些活动不太重要。

虽然一些研究报告显示太平洋地区农业生产可能正在下滑，但现有的有限数据表明，在整个生产和产后环节，妇女在农业的作用正在增加。关于小农户系统中妇女和男人工作的最新数据来自1999年萨摩亚的农业调查。该调查显示，所有年龄段的妇女都从事农场管理、生产和销售。例如，调查表明，绝大多数农场主为男性，为17 993人，女性仅有185人。五分之二的农场工人为女性，妇女负责几乎二分之一的农产品交易。从事手工艺品的妇女与男人的比例为9:1。考虑到周边国家中的相似性，该数据重新强化了这种观点，即在所有太平洋岛国，家庭系统中男女分担工。

萨摩亚农业普查进一步萨摩亚农业普查进一步反映出妇女在带薪农业就业中的作用，并表明了妇女参与兼职农业的新趋势。兼职妇女平均每月投入农业的时间为58小时，接近所记录的农业工人的时间(63小时)，高出兼职男性(53小时)。从事全职带薪工作的妇女，除了她们的全职工作以外，每周仍有大约8小时花在农业上。该趋势在周边的太平洋国家也可以看到。这也许反映出对农业自信心的丧失，一种分散风险的欲望，一种因生活费用增加和/或正常或专业投入要求水平低而补充收入的需求。妇女在兼职工作中的高度参与反映出特有的地方因素。在萨摩亚，该现象可能与人口外迁引起的农业劳动力不足有关。而在图瓦卢，则表明男人由于受雇于出海船而在农村的情况。

现有研究表明，在斐济和萨摩亚，妇女在奶业中扮演重要角色。瓦努阿图73%的养牛小牧民家庭中，妇女和男人一起修建牧场，除草和建筑围栏。对斐济的研究表明，在同一个村庄的居民中，妇女能够识别和利用更多植物。她们承担多种家庭和社区责任可解释这种现象 (Lechte, 1998)。

斐济、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和瓦努阿图经济状况的恶化，促进妇女从事的非正式交易，尤其是农产品，如作物、海产品、家畜、手工艺和熟食的交易显著增加。这对家庭粮食安全是一个很好的征兆。来自所罗门群岛的一份随机抽样显示，大约66%的妇女（三分之二）从事非正式交易。萨摩亚则为70%。该调查强调了这些国家非正式交易收入的重要性。因为在所调查的样本中，斐济高达70%家庭的唯一收入来自非正式交易。在索罗门群岛和萨摩亚，该比例分别为33%和24%。

在太平洋岛屿，作为当地经济的一个必要部分，深海捕鱼传统上是男人的领域，妇女和女童则在礁石和内海的海湾采集海产品。近来，全球对海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新技术（水产养殖和海藻工业）、鱼类资源枯竭以及对现金收入的需要，开始改变传统上的性别分工。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妇女从事捕鱼，在基里巴斯等国海产品已经成为主要出口产品的环礁社区尤其如此。

这些关于亚太地区各国农村妇女生活的短镜头，表明了所有年龄段妇女在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妇女在当地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系统中的广泛和多种责任，是她们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整个社区和家庭联系的一个因素，也是超出妇女控制范围的国家和全球性因素。

持续的单一家务劳动

作为整个亚太地区的一个社会现实，农村妇女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工作时间长，工作单调。尤其是，贫困妇女使用一系列生存措施来赚取足够现金养活和维持家庭，其中的一个侧面是家庭内外劳动时间过度延长。回顾现有的案例研究，有证据表明，基

农业中妇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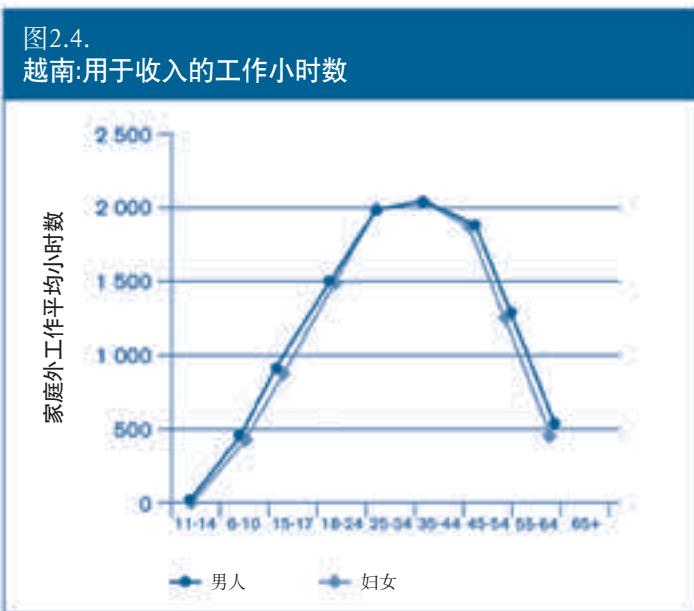
础服务不足，如饮水和卫生及需要寻找燃料和其它补充食品，使农村妇女的一天延长，劳动量加重。在印度大吉岭对山区妇女进行的一项案例研究表明，随着森林退化，在森林中寻找薪柴的困难加大，并导致妇女工作负担及对身体健康的损害加重 (Gurung, 1999)。

同样，尼泊尔妇女承担了家庭和农场工作的双重重担 (Acharya, Acharya, Sharma 1999)。国际农发基金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尼泊尔丘陵地区的妇女面临繁重的工作负担，身体受到伤害的程度高。尽管在不同阶层和社会等级之间存在差异，但与男人每天工作9到10小时相比，妇女每天大约工作16小时。除了过度的工作之外，该研究发现其中的许多妇女也挨饿 (IFAD, 1999)。

在巴基斯坦，许多农村妇女和女童的困境也无多大差别。她们的责任包括取水、备食、农业和其它家务劳动。这些工作不仅需要体力，而且剥夺了女童学习的机会 (Bari, 2000)。同时，妇女作为农民“无可见性”，意味人们对她们工作中危险的各个方面，如妇女作为巴基斯坦拾棉花劳动的唯一承担者，农药对其身体的伤害很少给予关注 (Nathan *et al.*, 1999)。

在中国，在云南一个村庄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妇女负责砍柴，一般每天用2到3小时时间，将70-80公斤薪柴从很远的山区背回家 (Jieru, 1999)。根据菲律宾的一项研究，农村妇女每天工作高达16小时，远远超过男人 (APEC North-South Institute 1999)。而在蒙古，向私有化转变使女性牧民的工作量增加，使她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延长（在已经很长的情况下）。尽管目前还没有系统的时间利用数据，但妇女劳动似乎已经利用过度 (UNIFEM, 2001)。

图2.4.
越南:用于收入的工作小时数



资料来源: Desai, 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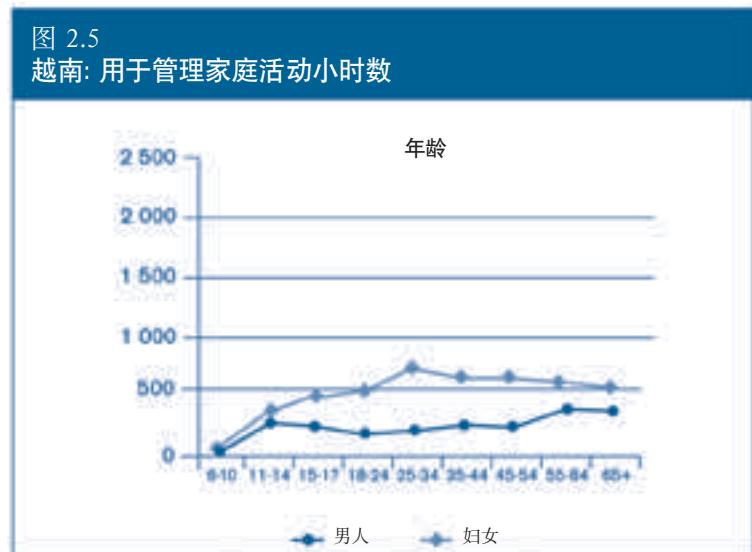
在越南，男人和妇女花在创收活动上的时间差距相对较小(见1997-1999年越南生活标准调查，如图2.4所示)。妇女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则几乎是男人的两倍。因此，在生命周期的每一点上，妇女工作的总时间一直超过男人 (Desai, 2001)。

在太平洋岛国，家庭花在自给农业生产和经济作物生产上的时间，与花在社会义务、家务劳动和非农经营及就业上的时间持平。比较萨摩亚妇女和男人的家务劳动，可以看出一个有趣的模式，即10-24岁之间的青年男性似乎花在做饭上的时间多于妇女。然而，由于妇女在照顾子女和洗涤这些传统上属于妇女的工作中扮演主要角色，妇女可能仍然面临繁重家务。

农村妇女工作的单一性引起了对农村妇女以及她们为加强家庭粮食安全所做各种努力的性别平等的关注。在妇女为获取粮食和生活用品所采用的措施中，时间是关键资源。亚太地区的多数农村妇女没有足够的时间。再者，即使有提高能力的项目，繁重的工作负担使她们几乎没有时间参加。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评估，发展中国家的妇女一般比男人工作的时间长。并且在维持和照料家庭方面承担了不成比例的责任。

为这些责任所花的时间常常意味着，妇女没有男人那么多机会去参加以市场为基础的工作或独立地赚取收入。这又使她们在家庭中讨价还价和决策的权力受到了影响，拥有的自由休息或自我照料时间较少 (世界银行2001)。认识到这些挑战，世界银行及其它一些机构提出了一系列区分性别的行动，以减少妇女在时间上的负担。在柬埔寨，人们以便改善能够减少妇女往返时间的物质基础设施，并以发展用户团体为手段来减少妇女花在取水和薪柴以及在水资源管理上的时间 (世界银行2002)。

图 2.5
越南: 用于管理家庭活动小时数



资料来源: Desai, 2001

随着农业多样化继续将劳动密集型工作转移给农村妇女，理解妇女的工作负担增加对农户福利的影响，并确保干预措施努力赋予妇女权力，集中为她们提供实际需要，以便减少家庭单调劳动，变得更加重要。农村妇女的工作负担应以目前正在形成的有关劳动强度和性别对福利影响的讨论背景进行考虑。这些讨论对家庭内部“讨价还价”和按性别分工都有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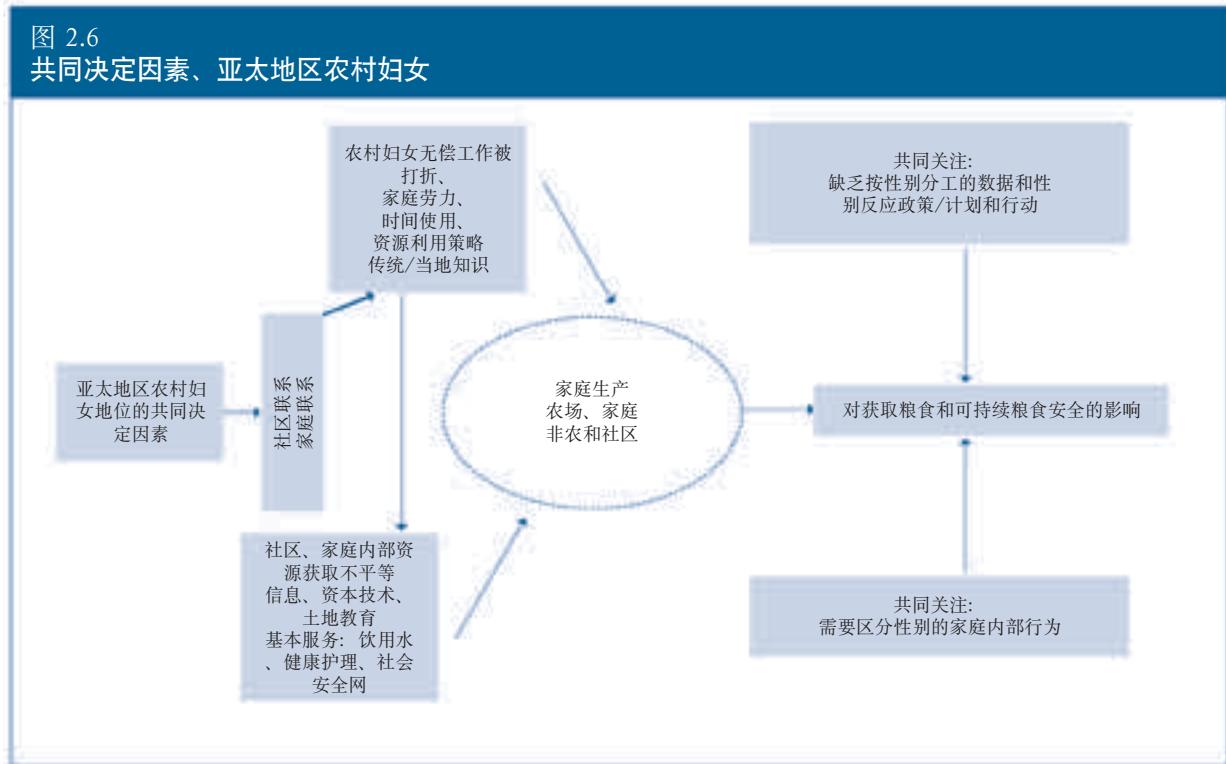
Jackson 和 Palmer-Jones认为，“在基于农业和自然资源的生计中有理由强调在连续绝对贫困背景下体力劳动的艰巨性，正说明了这些人口的贫困” (Jackson, Palmer-Jones, 1998)。在这种背景下，纠正农村所忽视的，如劳动妇女不能够获得足够的水、薪柴、卫生和保健资源，应该是关于性别平等宣言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持续的麻木不仁

对整个亚太地区农村妇女的分析性回顾，识别出两个共同的决定因素，即社区和家庭对农村妇女的劳动持续低估和资源获取不平等，一如图2.6所示。由于家庭和社区漠视农村妇女的劳动，导致妇女对农业和家庭生产的贡献被习惯性地打折扣和/或忽视。社会忽视加上经济冷漠导致妇女为支持和提高她们对一系列活动的贡献所必需取得的各种资源中存在显性和隐性的不平等。

根深蒂固的观念进一步低估了妇女在家庭中的价值，从而导致性别偏见扩散到社区的互动及政策领域。关于农村妇女劳动的数据少，加上缺乏对妇女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所做的无偿工作的关注及估价，使这种状况进一步持续。这造成部门政策和发展战略对农村妇女的忽视，并最终妨碍促进农业发展和加强粮食安全的各种努力。

图 2.6
共同决定因素、亚太地区农村妇女



资料来源: R. Balakrishnan

无偿劳动—社会上忽视和经济上冷漠

对全面理解亚太地区农村妇女现状对全面理解亚太地区农村妇女现状的一项持续挑战是，普遍缺乏系统收集和客观分析过的可靠数据。特别是，该地区现有宏观系统中常见的一个缺点是对生产、农业、创收活动和农村经济中妇女的数量统计不足。

例如，在孟加拉国，在农村地区42.5%的无偿家庭帮工中，妇女占83.2%（孟加拉国统计局，1996）。在柬埔寨，在15岁以上劳动力中，66%的无偿家庭工为妇女。

在印度，1997年国家统计资料将22%农村妇女划归工人。收集机构承认对作为工人的妇女数量统计严重不足。国家样本调查估计至少17%的农村妇女和近6%的城市妇女被错误地登记为“非工人”。由于对有关何为工作普遍存在错误的社会观念，在国家统



农业中妇女

计资料中大多数农村妇女工人都未列入。妇女在家庭土地上，或家庭企业中类似烹饪、打扫、照顾儿童和老人、集水、薪柴和饲料等无偿工作均未得到承认(Menon-Sen, Kumar, 2001)。

这种统计上的不可见性在巴基斯坦的表现是，尽管1980年农业普查估计农业家庭中73%妇女从事经济活动，但在劳动力调查中只有15%的妇女被登记。使用传统调查问卷，1990/91年劳动力调查报告的女性从事经济活动的比例为7%。当受访者被问及具体的活动，如移栽稻谷、拾棉花、磨面、晒种子和饲养牲畜时，该比例上升到31%。在与巴基斯坦有相同文化习俗，即妇女带薪工作被看作是对男性自尊和身份威胁的国家中，对妇女为多种家庭经济活动所做的大量贡献，都未给予足够的补偿 (Bari, 2000)。

在菲律宾，在农村劳动力中过度地少计算妇女主要是因为对“生产性工作”、“家庭工作”和“工人”定义混乱和模糊。妇女的工作被排除在计算国民生产总值之外的主要原因是，许多工作是自给性的和在家庭内部进行 (APEC 南北研究所, 1999)。在另一些国家，农村经济中的变化从根本上影响到妇女所从事的工作类型。这在国家就业统计资料中得到反映。在马尔代夫，发展出口型渔业剥夺了妇女从事有现金收入工作的机会，使她们成为看不见的无偿家庭劳动力 (Dayal, 2001)。

尽管统计资料显示太平洋岛国妇女在经济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其中一些国家的妇女因她们日复一日的捕鱼行为没有被政府、工业和银行视为工作，但她们仍然为争取在社区渔业管理中的发言权而斗争。结果，她们也许不能够获得贷款去发展小企业，不大可能获得制造职位方面的技能培训，不大可能获得关于养护实践的有价值的信息 (Robinson, 2000)。

总结喜马拉雅山脉兴都库什地区有关山区妇女研究的发现，Gurung 断言“由于目光短浅地将妇女的自给性工作标作‘内部工作’，因而无足轻重，发展计划人员直到最近还不承认妇女劳动对农业生产及家庭生存的重要作用” (Gurung, 1999)。由于这种短视，在整个亚太地区，农村妇女无偿劳动的巨大作用和贡献

继续在经济分析中被忽视，在社会中被低估。由于她们对农业和粮食安全的贡献得到的尊重如此之低，当地很少有支持措施来改善妇女状况和减少造成她们在获取资源方面不平等的各种困难。

同时，由于普遍缺乏考虑到工作妇女单独贡献的国家经济分析，造成不区分性别的政策和计划对国家生产力产生消极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必须澄清工作定义中的模糊之处，使现在看不见的妇女工人的贡献不再被掩盖。事实上，以家庭为基础的工人的例子说明，有必要改进非正式部门的统计资料，更好地了解政策对非正式部门的影响，以及非正式部门对国家经济的贡献(Chen, Sebstad, Connell, 1999)。

农村妇女获取资源不平等的

最近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强调了贫困妇女在获取资源方面所面临的双重劣势她们既贫困又是女性（世界银行2001）。在亚太农村地区不难找到有关的例子。在这些地区，因一直忽视现有服务和基础设施，使资源获取方面的不平等加剧。传统观念和态度使性别偏见一直存在，在获取社区和家庭资源方面歧视农村妇女。

同时，自然资源退化威胁妇女获取农村地区维持生计的资源。另一个令人日益担心的问题是，全球化的力量有可能进一步使农村妇女边缘化，并导致在资源获取方面更加不平等。农业和信息部门新的和正在出现的技术很可能绕过教育程度低的农村妇女。

获取土地

农村妇女获取土地一作为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一展现出了一幅关于法律权利和传统习俗以及由家庭喜好和个人做法所确定的财产继承之间相互冲突的混合画面(Agarwal, 1994; Bari, 2000; Tinker, 1999; Meinzen-Dick, Brown, Feldstein, Quisumbing, 1997)。在苏门答腊，继承制度正从严格的按照父系关系向更加人人平等的方

向发展，即儿子和女儿继承的土地类型更多与他们各自的工作相关。

尽管在土地继承方面无性别偏见，或有很少偏见，女儿在受教育上存在劣势 (Quisumbing, Otsuka, 2001)。资源上人人平等的交易也许在一定社会流行，但是土地法或土地法的执行则往往对妇女存在偏见。在农村，缺乏土地所有权或直接租赁权有可能进一步妨碍妇女获取灌溉和信用等资源 (Mehra, 1995; Agarwal, 1994)。

在整个太平洋岛屿地区，家庭成员在家长的保护下，按习惯拥有大多数土地。土地所有权有可能按照父系或母系关系传给下一代。由于种种原因，妇女在行使她们的权利时存在困难。尤其是，传统观念认为，妇女不需要土地，因为农业是男人的工作，妇女得到家庭支持系统的保护。此外心，即当妇女结婚时，给她们的土地就会失去。

最近，这些和其它一些歧视妇女的社会习俗已正式纳入法权。例如，基里巴斯土地法 (原始土地条例61, IX部分: 11- ii节) 中将习惯法正式纳入法律的条文规定：在儿子和女儿之间的土地分配中，长子所得比例应超其它兄弟，儿子所得比例应超过女儿。

获取信贷

提供小额贷款—通常免抵押和集体担保—为亚太地区农村男人和妇女提供了一项重要的资金来源。高经济回报率被归功为农村妇女良好的还贷表现。这种以集体为基础的小额信贷和小额融资方式，改善小交易机会出现时的现金流动状况，很好地满足了农村家庭短期的资金需要 (Zeller, Sharma, Ahmed, Rashid, 2001)。

但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的各种小型金融计划，存在明显差别。在加强农村妇女成为自我依赖的生产者和拥有个人权力的自信的贷款者所进行的能力建设的承诺方面尤其如此 (联合国 DAW/UNIFEM, 2001)。由于农村家庭依赖较长的农业生产和畜牧饲养周期，他们通常没有每周流动的现金，小额贷款所规定的

还款条款（义务性和每周还款，加上一定存款）和利率不适合农村家庭的需要。因此这种以妇女为中心的信贷模式迫使农村妇女去追求另外的、替代性的创收措施，以便能够按计划还款。这导致她们的工作量加重。

近来的一些研究对小额贷款能效提高妇女权力的假设提出了质疑。这些研究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妇女充当了家庭中男人获取资金的前锋，她们对以其名义所贷款项缺乏实际控制权。简而言之，对表现的过于重视主要是以高还款率来衡量已经影响到批准和回收贷款人员的动机，导致人们更少注意妇女是否和如何才能真正控制她们自己的投资活动 (Goetz, Gupta, 1996)。

在太平洋岛屿地区，由于妇女缺乏抵押和贷款数额小，她们在向商业银行贷款时，往往遇到困难。一些现实情况，如银行通常位于城市地区，加上妇女缺乏对银行程序的了解，进一步妨碍了女性获得资金。这种情况下，许多妇女组织制定了储蓄和贷款计划。按照这些计划，其成员可以定期存款和选择以合理的利率借款。然而，与这些计划相关的主要制约因素包括管理上的弱点，以及经营小规模计划并在农村地区执行这些计划的成本很高 (Fairbairn-Dunlop, Struthers, 1997)。

在斐济、马绍尔群岛、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和太平洋岛屿进行的一项关于妇女与粮食生产的研究发现，家庭菜园的质量取决于是否有土地、土地数量、土壤、妇女所能获取的种植材料、培训、是否有劳力和有关病害虫的知识。在一些环礁岛国，土壤贫瘠、雨水及海潮对菜园的冲刷等也造成困难。在所研究的每一国家，拥有最成功的菜园的妇女来自双收入或高地位家庭。这表明培训本身不足以实现家庭粮食安全 (Fairbairn-Dunlop, 1997)。

环境资源

自然资源退化直接影响到农村妇女的生产率和获取替代生计的机会。迄今的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森林和沿海资源退化对妇女获取

资源的影响上。关于土壤和水资源退化对女性工作模式影响的信息十分有限。一项研究揭示了马来西亚沙捞越北部传统上依赖打猎、采集和农业轮作的原始社区的生计是如何受到伐木、毁林和政府原始土地政策改变的威胁的。这导致了土壤侵蚀，河水质量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和鱼类及野生动物种群减少。结果是，寻找替代生计引起男人外流，留下妇女应付不断下降的资源基础 (Heyzer, 1996)。

获取环境资源，对劳动的管理，使生计措施和决策过程多样化的能力方面存在性别不平等，造成了男人和妇女在如何面对贫困和环境变化方面出现显著差别 (Masika, Joekes, 1997)。经过对印度农村30多年地区性差异和临时性变迁的分析，Agarwal 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自然资源退化、私有化和邦政府对自然资源的占用对农村家庭中的女性成员造成了特别消极的影响 (Agarwal, 1997)。

在巴基斯坦北部，近年来，在农业生产力显著提高和畜牧业生产增加的同时，森林覆盖率大量减少。同时，妇女的农业劳动量加重，而男人则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创收活动。这使男人得以垄断获取社区的货币经济，使妇女没有任何权力 (Joekes, 1995)。

在尼泊尔，一项研究对过去20年间现有环境物品采集方面妇女的工作量进行了审查。该研究发现，虽然所有家庭成员用在采集各种当地资源，如水和木材方面的时间减少，但妇女花在采集上的时间下降最多。同时妇女所花时间占总采集时间的比例也下降。鉴于该地区妇女在采集上所花的大量时间，以及由此带来的负担，这一结论表明了一种正面趋势，即这可能是由现有当地环境资源的增加促成的。例如，在研究的每一地区，至少安装了一个水管。同时一些人注意到在研究所涉及的14年间，他们的社区森林状况得到改善(Cooke, 2000)。

社区组织

促进发展妇女团体，作为一种扩大妇女获取信息，增加协商能力和创造机会采取集体行动获取经济投入的手段。然而，实际

上，持续的性别偏见，根深蒂固的社区动态和妇女在时间上的制约，妨碍她们积极参加这些旨在给她们带来社会效益和女性权力的团体。

广泛存在的将灌溉管理责任从邦转移给社区，或转移给当地用户团体，忽视了社区内权力差别对水资源管理效率和公平的影响。性别是反复造成这种差别的一种原因。尽管存在各种赞美之词，就妇女的参与而言，回顾南亚有关的证据显示女性参与用水团体是最少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正式和非正式的成员标准将妇女排除在外 (Meinzen-Dick, Zwarteeven, 1998)。

许多因素已被认定为限制妇女参加正式环境管理机构的制约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规则、习俗、观念，已形成的对土地的占有，以及家庭和妇女的经济及社会禀赋 (Agarwal, 2000)。主要从事家务和农场劳动的妇女每天极其繁忙，不大可能有时间参加会议。农村地区的一些妇女也许与男性垄断的政府阶层没有联系。柬埔寨的一项以工代赈项目发现，独身妇女和贫困妇女，由于她们花在独自工作，寻找食物、担水和照顾家庭上的大量时间而与村庄隔绝 (WFP, 2001)。

获取教育和技能开发

在获取教育上的性别差异是影响农村妇女获取其它资源的不平等的一个关键方面。世界不同地区进行的多项研究，纪录了妇女教育对儿童教育和营养的重要性；教育对赋予女性权力至关重要。如果妇女想发展参与知识密集型经济活动所需的技能，她们至少需要基础教育。

无法获取基础教育的妇女，很可能被排除在新的机会之外。并且，由于长期存在于教育上的性别差异，这些妇女面临更大的、使她们参与发展的能力落后于男人的风险。(King, Alderman, 2001)。亚洲研究已经记录了妇女在参加教育和培训上的不平等。在巴基斯坦25个农村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一系列严重的供给方

面的制约 (村庄附近没有足够的女童小学，缺少女教师) 剥夺了女童接受初级教育的机会 (Sawada, Lokshin, 2001)。

同样，在印度南部，有关研究认定了一系列将贫困男童和女童排除在教室之外的因素，其中包括贫困，童工的机会成本和已形成的社会及文化习俗所造成的宗教等级、阶层和性别不平等 (Subrahmanian, 1997)。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花在无偿工作上的时间是妇女提高其技能和培训的主要障碍 (APEC 南北研究所, 1999)。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开发和传播计划尚未充分解决与不同生产活动相联系的家庭劳动的单一性。尤其是，这些计划未认识到农村妇女对提高她们生产力的技术的需要。在尼泊尔，尽管国家政策和计划致力于赋予妇女权力，但在开发和传播针对女性农民需要的新的改进农业工具方面很少作出努力 (Guatam, 1999)。

在孟加拉国，一项关于现代农业技术对家庭影响的参与性评估认定了多项为何贫困妇女未能利用新技术知识的原因，其中包括不利的土地占有制，由深闺制度确定的工作场所的性别划分，以及家庭地块面积有限 (Naved, 2000)。

在畜牧部门，大多数技术解决方案包括那些针对妇女的方案忽视了妇女的需要，而生产系统的改善总体上加大了她们的工作量。今后，应考虑到妇女工作量及技术对她们的地位、资源和财产的经济控制的潜在影响而设计适当的技术 (Niamer-Fuller, 1994)。正如一位著名的印度科学家M.S. Swaminathan所强调的那样，“如果妇女被赋予技术信息和技能，家庭的所有成员都会受益” (UNDP, 2001)。

新技术

近期在基里巴斯、斐济和萨摩亚完成了**亚太地区性别科学和技术项目**。该项目的重点是生物技术、环境、水、能源和信息技术。该项目的一个主要结论，妇女获取技术主要通过依靠捐助方供资的妇女非政府组织 (斐济妇女经济, Wainimate 和南太平洋大学所属

研究所)。农业研究和推广服务目前仍将注意力放在出口作物和男人上。亚太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应该增加获取非农就业的机会，并促进农民采用新技术和信息以及支持服务 (Nathan 等, 1999)。

农村贫困的女性化

国际农发基金的一项评估承认亚洲农村的贫困女性化，并注意到两个主要方面。尤其是，该地区妇女为家长的家庭通常比男人为家长的家庭更贫困。因妇女及其子女更难逃避，贫困程度更严重，对妇女约束更大 (IFAD, 1999)。根据这项研究，女性为家长的家庭在柬埔寨 (35% 的家庭女性为家长)、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的比例很高。在尼泊尔女性为家长的家庭占无土地和边际农户总数的16%。

在柬埔寨，男人和成年子女的外迁产生了积极和消极影响。一些男人和子女在外工作有可能寄钱回家，明显提高了家庭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那些丈夫长期在外的妇女可能遇到一些类似单身贫困妇女的困境。例如，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项研究表明，男人不在的家庭中妇女没有足够渠道接触决策网络、法律知识和稻米、劳动等财产 (WFP, 2001)。同样，越南生活标准调查认定，女性为家长的家庭中劳动力短缺是扩大经济资产和农业生产力的一项重要的资源制约。在越南的农村地区，女性管理的企业的平均利润是男性管理企业利润的84% (Desai, 2001)。

太平洋岛屿妇女所面临的特殊困难包括由劳动力外移和儿童入学，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以及男劳力的季节性变化造成家庭劳动力短缺。在基里巴斯和图瓦卢，男人长期在海船上从事带薪工作。与此同时，传统上保护妇女不受经济负面影响的家庭支持系统也正在受到侵蚀。婚姻破裂不断增加，未婚先孕数量增加。所有这些都导致以女性为家长的家庭增加。简而言之，这些因素意味着今天整个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妇女作为一个群体，最容易遭受贫困。



农业中妇女

资源和可持续粮食安全

表2.4指出了妇女所面临的在资源获取方面不平等的各个方面。该表说明了不平等的内在关系及其与遍布生产各个环节的可持续粮食安全的联系。粮食安全的主要风险包括改良土地和提高生产力的鼓励措施少，收入来源多样化的机会不足、能力有限。妇女没有时间提高农业生产，这也意味着在家庭危机和作物损失时，农村家庭营养摄取量低和粮食获取不确定。这些因素对提供足够粮食，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影响。

表 2.4
农村妇女资源获取不平等表

生产环节	资源领域	获取问题	不平等关系	实现可持续粮食安全的风险
农场生产	土地	缺乏土地权和获取土地的机会 获取用于生产的土地不确定	没有法定土地权 习惯法和当地实际情况 对给予平等权利的土地法规的实施程度差 妇女不热衷于行使土地法权利和所有权责任 公共财产的私有化	改良土地和提高农业生产率 缺乏鼓励措施，对国家粮食供应和粮食安全有影响
	森林资源	无法获取非温带森林资源 牲畜缺乏牧场和饲草	森林保护措施 私有化造成社区资源使用的变化	缺乏收入多样化和粮食获取的手段
	土壤和水	没有土壤肥沃的好土地 无法获得灌溉和生产用水	有限的可供自给型生产的土地质量退化，无力协商获取肥沃土地 劣质水和缺乏参与用水团体 在用水团体内不能清楚表达要求和需要	改良土地和提高农业生产率 缺乏鼓励措施，对粮食供应和国家粮食安全产生影响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第二章

生产环节	资源领域	获取问题	不平等关系	实现可持续粮食安全的风险
农场、家庭和非农业生产	技术	无法获取适于妇女所从事生产活动的技术 无法获取家庭技术 缺乏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质量的技术 无法获取现有技术、生产方法和技术信息	过去和目前仍忽视妇女在技术开发方面的需要和作用 由于女性技能和教育水平较低和性别偏见倾向于男人，以机械化代替妇女 假设用于家务的技术是女性家庭化的同义词 忽视妇女家庭生产所需的技术的妇女技术培训计划薄弱和不足 妇女缺乏时间和教育水平去利用技能培训和技术转让计划	收入和粮食获取多样化的手段有限 提高农业部门的生产率缺乏鼓励机制，对粮食供应和国家粮食安全产生影响
	劳动力	缺乏农业技术所需的现有劳动力 无劳动力从事家务劳动	由于男性外流，以女性为家长的家庭数量增加 缺乏男劳动力，女性为家长的家庭规模小 家庭结构和亲属网络的变化	收入多样化和粮食获取的手段很少 提高农业部门的生产率缺乏鼓励机制，对粮食供应和国家粮食安全产生影响
	贷款	无法获取进行农业生产和建立和扩大企业规模的正式贷款	农村银行和农村信贷系统不完善 由于缺乏传统形式的抵押（如土地、房屋），在大额贷款中，妇女被视为不可靠的客户 官方贷款交易中，男人被视为家长	收入和粮食获取多样化的手段很少 提高农业部门的生产率缺乏鼓励机制，对粮食供应和国家粮食安全产生影响
	农业支持服务 体制资源	无法获取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生产投入 缺乏非农业劳动就业 无法接触发展组织和政府机构	提供农业支持的系统差 缺乏适于农村妇女的适当信息和处延活动 传统偏见忽视妇女在农业中的作用，从而忽视对性别敏感的农业推广计划 妇女教育有限和缺乏对公共部门和计划的理解 农村就业计划方面的投资不足 妇女缺乏教育和适当技能去利用新的经济机遇	收入多样化和粮食获取的手段很少 提高农业部门的生产率缺乏鼓励机制，对粮食供应和国家粮食安全产生影响

破土：
农业中妇女的现状及前景



农业中妇女

生产环节	资源领域	获取问题	不平等关系	实现可持续粮食安全的风险
			公共部门机构传统上使妇女边缘化 妇女关于公共部门机构和服务的知识不足 妇女缺乏与公共部门发展机构打交道的能力	
市场和商业联系		可靠市场的准入有限 与城市商业中心的联系不足	农村地区市场基础设施差和 市场信息服务有限 利用农村生产者生产性资源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忽视女性生产者 全球经济联系	缺少收入多样化和粮食获取的手段 提高农业部门的生产率缺乏 鼓励机制，对粮食供应和国家粮食安全产生影响
家庭生产	饮用水、卫生、保健和儿童照料服务	无法获取履行照顾家庭责任 所需的基本服务	农村地区服务基础设施差 传统上认为妇女需要少和习惯于处理困难任务 缺乏联系农村社区与服务中心的道路和交通	提高农业生产率妇女没有足够时间和精力，对粮食供应和国家粮食安全产生影响 农村家庭的营养摄取差
社区生产	正式安全网	在家庭危机时，无法获取现金或支持性服务 社区组织的准入 家庭关系网络的准入	过去和现在都忽视了农村社区所需的适宜作物/牲畜和个人/医疗保险或现金转移 缺乏技能去对付外部有组织的社区团体 男人占据领导地位，主宰了社区组织中的讨论 妇女遵循传统，没有有效表达她们对资源的需要 妇女缺乏时间和技能，阻碍了她们的积极参与 扩展家庭体系和传统亲戚关系网络的瓦解	农村家庭在遭遇家庭危机和作物损失时，粮食获取不确定 缺少使收入多样化和粮食获取的手段

地区趋势

社会、经济和技术领域近期的一系列发展，包括经济一体化、商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农业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政治不稳定、内战、艾滋病毒/艾滋病、自然灾害，对亚太地区农村妇女造成重大影响，其中包括家庭健康、农业生产率和经济福利。很少有系统性的研究考察这些趋势对农村妇女的影响。以下说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即经济一体化和农业及信息技术的进步给农村妇女的生计和工作同时带来了机遇和威胁，而政治不稳定、自然灾害和艾滋病毒/艾滋病则对农村妇女产生巨大的额外压力。

1990年代的经济危机

东南亚经济危机导致城市地区的贫困大量增加。尽管对农村地区和农业的影响并不像当初担心的那样大，但是这些影响是广泛的。考虑到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巨大差异，一些农村地区受到的影响格外严重。总体上，因危机引起政府缩减农村开支，汇款数额减少，失业的城市工人返回农村，以及随之导致农村家庭收入需求增加，农村贫困人口受到不利影响 (Hooke, Warr, Shaw, Forde, Brassard, 1999)。

然而，主要由于危机被认为是一种城市现象，目前尚无系统性的研究来分析亚洲危机对农村妇女的影响。在全球层面，人们认为，不考虑到性别关系的重要方面（包括妇女无偿的再生产工作和家庭内部分配），造成了关于经济自由化对劳动力市场内外妇女影响的不准确评价 (Fontana, Joekes, Masika, 1998)。这引起了如下问题：农村妇女的生计措施是否和如何缓冲经济危机对亚洲农村地区的影响。

全球化

经济一体化可以在国内和国家之间发生，与经济全球化加快的趋势也许有也许没有联系。不管是否有全球市场准入，农村生产可以从自给性农业转变为现金经济；然而全球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作为一种力量，可以影响生产，并对农村妇女产生影响。差异取决于农业企业的规模和类型（联合国大会，1999）。

由于妇女采取行动在当地市场和城市中心销售她们自己种的农产品、小牲畜和家庭自产的食品，对现金的需求可以推动自给性生产商业化。这些家庭自产物品有可能面对来自工业加工食品的竞争。

容易追踪全球市场对农产品需求对一定大小的土地拥有量，包括由农业家庭所承担的合同生产，或者是对要求具有一定教育和技能标准的农业加工企业的直接影响。在这些追求夺取全球农业市场份额的生产系统中，具有基本技能和教育的妇女能够增加她们的经济机遇。

然而，对正式劳动合同的处理和条款的理解不透彻，使妇女面临受剥削的风险。与此同时，全球消费者爱好和需求的变化，使参与这类农业合同企业中的农村妇女的经济风险增加（联合国 DAW/UNIFEM, 2001）。

此外，受全球金融机构所制定的小额贷款限制的社会计划，经常对农村妇女造成问题。当全球层面的金融市场一体化和正式贷款组织作为一种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村企业的方式而受到鼓励时，小额贷款计划的影响仍不确定。

新技术

生物技术作为一种新的力量已经在亚太地区出现。以非政府部门（多数反对）和科学界及私营部门（支持）之间强烈不同的观点为标志，有关生物技术利弊的争论仍在继续，毫无减弱的势头。

现代生物技术对实现人人享有粮食安全所做贡献的程度，目前仍然是一个未找到答案的问题 (Pinstrup-Andersen, Pandya-Lorch, Rosengrant, 1999)。

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地区的多数政府似乎采取了一种“关注、等待和观望”的态度。对新的生物技术推动的农业革命所带来的潜在机遇和风险，妇女农民知道和了解的程度如何，总体上缺少相关信息。鉴于整个地区中妇女受教育程度低，而以生物技术为基础的农业则需要高度精密的生产组织，有理由推测大多数农村妇女将被这些发展进一步边缘化。

信息和通讯技术 (ICTs) 在促进妇女获取信息和知识、加强教育和学习、加速技术转让方面的潜力，已被亚太地区的许多人认可。在一些国家，广播和电视广泛用于告知和教育农村妇女有关健康、营养和农业的信息。一些关于使用新的ICTs赋予妇女权力的成功事例，如孟加拉国的Grameen交流网络、印度安得拉邦、卡纳塔克邦和奥里萨邦的ICT计划及马来西亚电视推销业所创造的农村就业，被用作新信息技术潜力的例子，。

尽管有这些潜力存在，“数字鸿沟”增加有可能加剧城市与农村社区之间在知识和教育上的差距，其威胁是真实的。因特网联接，包括相关语言内容的提供和质量，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已经不同。与大多数亚洲国家相比，太平洋岛国妇女获取和使用信息技术，基本上限于城市地区，且总体上较少 (Fairbairn-Dunlop, 2001)。

在更多利用ICT赋予妇女权利方面，存在若干障碍，其中包括基础设施不足，费用高和能力有限；所有这些问题在农村地区更加突出(Atkin, 1998)。ICTs在推广服务方面传递传统男性偏见的程度，尚未验证。当然，只要用户友好和性别敏感的信息材料得到开发，发展人员受到良好培训并具有性别敏感性，用ICTs教育大量农村妇女和男人并赋予他们权力的机会就会存在。

政治不稳定和冲突

整个亚太地区政治不稳定增加，冲突增多，已经加大了对许多农村生产者的压力。阿富汗、东帝汶和斯里兰卡的冲突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的影响已众所周知。然而，太平洋地区布干维尔岛和所罗门群岛发生的内战及民族矛盾所造成的影响却少有文字报道。对妇女而言，由于男人卷入冲突、政治不稳定和冲突导致了更多的农业工作。即使在和平的国家，地雷持续提醒过去的冲突，对农村社区构成真正的威胁。在柬埔寨和老挝，被扔弃的炮弹数量之多，迫使农民不得不放弃良好的土地。

人口压力

在亚太地区的许多地方，人口压力对农村家庭已经造成严重影响，尤其影响到妇女的工作、谋生手段和护理活动。太平洋岛国的人口每30年翻一番，对自然资源和粮食安全造成很大压力。快速向城市迁移 以青年男性为主 在增加城市人口密度的同时，导致农业劳动力严重短缺。例如，在马绍尔岛，9000多人生活在Ebeye岛上，而该岛面积不足0.5平方公里。南Tarawa(基里巴斯)、Majuro(马绍尔群岛)和Funafuti(图瓦卢)的城市中心人口密度极大，增加了家庭菜园占有土地、清洁水供应的压力，同时导致了很高的失业率和更容易出现贫困的情况。

艾滋病毒/艾滋病

同样，艾滋病毒/艾滋病对农村人口和粮食安全的影响是该地区许多地方关切的问题。艾滋病毒/艾滋病在湄公河流域各国，尤其是缅甸和泰国大量流行 (Bain, 1998)。经济一体化的加强、前所未有的增长、和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人们为寻找这些机遇开始流动。艾滋病毒/艾滋病的蔓延与不断增加的流动人口有关。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了农村与城市地区和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不平衡。在多数地方，健康和教育系统

不能满足这些城市新居民的需要。轶事和观察信息进一步表明，感染了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城市居民回流到农村村庄，有可能增加对农村妇女作为创收者和照料者的需求。

自然灾害

亚太地区以容易遭受自然灾害，如洪水、干旱、台风和地震而闻名。自然灾害发生率上升导致财产和农业资产严重损失，威胁到农业生产，加剧了易受害程度，导致粮食冲击和粮食不安全 (Ninno, Dorosh, Smith, Roy, 2001; FAO-RAP, 2001; O’ Brien, 2001)。

各种案例研究和事例表明，在构成社会对风险伤害的脆弱性及对危害和灾难的反应时，性别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一个灾难周期，男人和妇女明显采用不同的应付措施。孟加拉国在1991年的龙卷风时期，据报大量伤亡人员为妇女。这是由于社会对她们的流动性所施加的限制以及她们照料儿童和牲畜的责任，使她们没有收到警报信号。

同样，在灾后期间，妇女遭受困难更多。她们因多重角色引起的工作量急剧增加。与此同时，她们的许多传统创收活动，家庭菜园和牲畜都消失了。妇女(不像男人)无法到家庭以外去寻找工作(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2)。在这种情况下，在灾难管理方面需要具有性别反应能力的体制变革和集体行为措施，使妇女的对灾难的易受害性与她们已经被证明了的在困难情况下的应付能力保持平衡 (D’ Cuhana, 2001)。

虽然一些案例研究和经验性发现表明了近年来全球化、技术进步、艾滋病毒/艾滋病趋势在该地区造成的影响。这些发展对农村家庭，尤其是妇女的综合影响尚未系统研究。未来，必须将农村地区的性别分析纳入宏观趋势的大环境中，以便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支持农村妇女有效地管理这些变革的力量。



结论

在整个亚太地区，农村妇女对农业和农村生产的贡献多种多样，并受到特定社区和所涉家庭的独特因素的影响。普遍情况是具有变化和连续性，灵活性和僵化性的特点。不断增加的经济压力促使许多妇女改变她们的角色，从事一系列通常与她们无关的工作。

尽管有这些经济领域中的新责任，但妇女上在家庭范围内继续维持她们传统上的性别角色；男人的角色未发生同样的变化。妇女已经承担更多传统上属于男人的工作，但社会习俗上的严格边界仍为男人维持着。这已经给妇女带来更多的工作量和对体力要求大、回报率低的工作责任。

在农村妇女工作量增加且繁重的情况下，获取生产资源方面的性别持续不平等所造成的影响日益严重，并关系到粮食不安全的风险上升。缺少对妇女工作及单调性以及对资源获取方面不平等的关心，已经植根于性别偏见之中，并通过家庭和社区层面的文化制约和社会习俗得以延续。反映在家庭内部行为上的偏见蔓延到政策领域，助长了无法控制的性别不平等。

经济一体化、环境退化、移民、技术和对自然灾害持续脆弱方面的地区趋势，已经对农村妇女发挥作用的不同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农村妇女 以及延伸到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面临的机遇和威胁 尚未系统地研究、分析和量化，而用于支持政策和规划的制定。

建议

通过回顾亚太地区农村妇女的状况可以看出，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已经下降，但农村妇女在农场和家庭经济中的作用显著增加。尽管如此，农村妇女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巨大贡献，在地方或国家层面并没有得到广泛或正式承认。

由于缺乏对她们所做贡献和作用的认识及评价，支持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努力往往忽视妇女对资源的需求和她们在发挥其生产作用时所面临的制约。与此同时，新的地区趋势和外部力量正在根本性地改变妇女所处的环境，为她们未来的生计带来了机遇和威胁。

因此，下面的建议力求将注意力放在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中的农村妇女身上，以及加强政策和计划干预措施的需要上，以便提高她们的总体福利。

改进信息和数据

应收集该地区农业和农村发展各个方面按性别划分的数据和性别差异的信息。这将能够对农村妇女所处环境和作用与男人和城市人口对比的情况进行综合了解。这样一种数据库将有助于开发具有性别针对性的人力资源和活动数据库，从而可以进行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分析及比较。

必须提高各国政府对按性别划分数据的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国家部门收集、管理和分析信息的能力。在那些国家样本调查或者其它调查已经收集按性别划分信息的国家，应该对这些数据进行系统性分析，以便对农村妇女的状况进行深入了解。应该利用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先进的数据管理系统汇编相关的、以需求为基础和用户友好的信息资源。然后，可将这些资源提供给政策制定者、计划管理者和宣传团体。

将性别纳入农业和农村发展规划

在亚太地区，在农业和农村发展规划中使用现有的按性别划分的数据的好处尚未被人们广泛了解。在规划过程中使用现有数据的努力不够，突出说明在涉及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及规划制定的机构中需要进行能力建设。这些努力应该集中在将性别和性别差异性指标纳入整个计划及项目周期的各个阶段。

无偿劳动的估值

国家政府、双边和多边组织及学术机构应该明确承认妇女的无偿劳动在家庭和农场生产系统中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对这种劳动的确切估值应该达成一致。就粮食安全而言，农业家庭生产的家庭生产模式，为无偿工作投入的量化提供了一种方法。要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说服包括农村妇女在内的不同利益相关者，承认和补偿农业和农村生产中的无偿劳动。

增加获取教育和信息的机会

在国家层面要增加资源和加强努力，实质性地改进女童的正规教育，提高成人女性的识字率并通过知识和信息赋予农村妇女权力。应该探索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在减少年长农村妇女面临的教育劣势方面的潜力。这可以通过开发和传播适当形式的以需要为基础的信息及接触媒体来进行。

减少家庭单调劳动

要减少家庭的单调劳动，就必须改变对妇女无偿工作毫无价值的持续传统看法。在农村地区应发展基本服务，以支持妇女在家庭、社区和农业中发挥的许多作用。应开发适当技术，减少妇女在日常家务上花费的时间。

技术开发和培训

鉴于女性拥有当地知识和发挥各种作用，农村妇女应充分参与开发面向女性的技术。应深入评估农村妇女在各种情况下发挥的作用和面临的制约，以指导这些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培训应根据妇女的各种生产任务加强她们的能力。应掌握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增加妇女获取信息技术和公共部门支持服务的机会。

性别和地区趋势

应该开展系统研究，认定和评价重要的地区发展和趋势 包括经济一体化、新技术、艾滋病毒/艾滋病、政治和内部不稳定及自然灾害 对农村妇女的作用、工作、获取资源机会和生计的影响。决策人员在制定部门政策和计划时应考虑这些研究，以便农村妇女能够利用新的机遇，同时尽管减少可能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 Acharya, M.P.M., Acharya, B. & Sharma, S.** , 1999, “尼泊尔妇女”，《ADB国家简报》，马尼拉，亚洲开发银行。
- Agarwal, B.**, 1994, 《一块自己的土地：南亚的性别和土地权》，剑桥大学出版社。
- Agarwal, B.** , 1997, “性别、环境、和贫困的内在联系：印度乡村区域差异和临时性变迁，1971-1991”，《世界发展》 25(1)。
- Agarwal, B.**, 2000, “环境集体行为的理论构思：为什么性别起作用”，《剑桥经济学杂志》 24 (3)。
- Ahmad, A.**, 1998。 “马来西亚妇女”，《国家简报》，亚洲开发银行。
- APEC 南北研究所**, 1999, 《时间代替工作：人力资源政策中有偿与无偿工作之间的联系》，渥太华。
- 亚洲开发银行**, 2000, “塔吉克斯坦妇女”，《国家简报》。
- 亚洲开发银行**, 2000, 《亚洲农村的一项研究：回顾 — 超越绿色革命之上》,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 亚洲开发银行**, 2001, 《关键指标：亚太地区的增长和变革》，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 Atkin, H.**, 1998, 《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妇女和电讯》，农业妇女和现代通讯技术研讨会论文集。www.husdry.kvl.dk/htm/php/tune98/13-HelenAitkin.htm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第二章

Bain, I., 1998, “东南亚”，《国际迁移》 36 (4)。

孟加拉国统计局, 1996, 引自亚洲开发银行, “孟加拉国妇女”, 《国家简报》, 2001八月。

Bari, F., 2000。 “巴基斯坦妇女”, 《国家简报》, 马尼拉, 亚洲开发银行。

Bloom, D.E. Craig, P.H. 等, 2001, 《亚洲乡村的生活质量》, 纽约, 牛津大学出版社和亚洲开发银行。

Brown, L.R., Feldstein, H., Haddad, L., Pena, C. & Quisumbing, A. , “在2020年创造粮食安全: 妇女作为生产者, 看门人和吸收冲击者”, 《2020 远景简报》 17, 华盛顿特区,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Chen, M., Sebstad, J. & Connell, L. 1999, “将看不见的劳动力计算在内: 家庭工人的例子”, 《世界发展》, 第 27卷。

Cooke, P.A., 2000, 《环境物品采集中家庭内部劳动配置的变化: 来自尼泊尔乡村的例子, 1982 和 1997》, 华盛顿特区,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D'Cuhana, J., 2001, 《将灾难管理支持特别向妇女倾斜: 从地区角度透视》, FAO-RAP 对FAO亚太会议关于粮食和农业灾害早期预警、防范、准备和管理的报告, RAP出版2001/14, 曼谷, 粮农组织 亚太地区办公室。

Dayal, R., 2001, “马尔代夫共和国妇女”, 《国家简报》, 亚洲开发银行。

Desai, J., 2001, 《透过性别角度看越南: 五年之后》, 越南 第二次生活水平调查的初步结果, 提交给粮农组织亚太地区办公室和UNDP越南办公室的报告。

Estudillo, J.P., Quisumbing, A.R. 等, 2001, “菲律宾乡村土地继承和就学投资上的性别差异”, 《土地经济学》 77 (1)。

Fafchamps, M. & Quisumbing, A.R., 1999, 《社会角色、人力资本、和家庭内部劳动划分: 来自巴基斯坦的证据》,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FCND 讨论文章 No.73, 华盛顿特区。



参考文献

- Fairbairn-Dunlop, P.**, 1997, “太平洋妇女的三重农业角色：粮食安全，非正式贸易和经济作物生产”，《南太平洋农业杂志》，第4卷，第1期。
- Fairbairn-Dunlop, P. & Struthers, J.**, 1997, 《妇女社会和经济开发项目(WOSED)回顾》，惠灵顿, MFAT。
- Fairbairn-Dunlop, P.**, 2001, “太平洋岛国经济：近期增长经验”，《亚太地区远景公告2001/02》，ESCAP, 联合国。
- Falcon, W.**, 1996, 《评论：粮食政策真正起作用：20周年讲演》，华盛顿特区,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1-4。
- Felsing, M., Brugere, C., Kusakabe, K. & Kelkar, G.**, 2000, 《妇女为水产业还是水产业为妇女》，国际INFOFISH 3/2000。
- Fontana, M., Joekes, S. & Masika, R.**, 1998, 《全球贸易扩张和自由化：性别问题和影响》，第42期报告，布赖顿, 发展研究所。
- FAO**, 1996, 《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
- FAO-RAP**, 2001, 《FAO亚太会议关于粮食和农业灾害早期预警、防范、准备和管理的报告》，RAP发布: 2001/14, 曼谷, 粮农组织亚太地区办公室。
- Goetz, A.M. & Gupta, R.S.**, 1996, “谁取得了贷款？孟加拉国乡村信贷计划中性别、权利和对贷款使用的控制”，《世界发展》，第24卷，第1期。
- Gray, I. & Wouters, B.**, 1999, 《JICA: 关于妇女发展的国家概况》，“柬埔寨的性别和发展”。
- Guatam, S.R.**, 1999, “尼泊尔女性农民对农业机械化的需求”，《政策展望》，加得满都, HMG 农业部, 温洛克国际组织, 系列丛书No. 4。
- Gurung, C.**, 1999, “印度大吉岭和锡金地区案例研究”，选自Gurung J.D. (编辑)., 《在印度克什喜马拉亚寻找妇女的声音》，加德满都, 山区开发一体化国际中心。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第二章

Gurung, J.D., 1999, 《在印度克什喜马拉亚寻找妇女的声音》, 加德满都, 山区开发一体化国际中心。

Heyzer, N., 1996, 《森林退化背景下的性别、人口和环境: 马来西亚案例研究》, UNRISD 和亚太发展中心。

Hooke, G., Warr, P., Shaw, B., Fforde, A. & Brassard, C., 1999, 《危机时期的农业: 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影响》, 堪培拉, 澳大利亚政府海外援助项目。

IFAD. 1995, “中国乡村妇女的地位”, 罗马。

www.ifad.org/gender/learning/role/workload/34/htm

IFAD. 1997, “影响妇女工作量的因素: 性别和家庭粮食安全”, 尼泊尔,
www.ifad.org/gender/learning/role/worklod/24.htm

IFAD. 1997, “印度部落妇女对家庭开支的控制”。

www.ifad.org/gender/learning/role/decision/in_1_3.htm

IFAD. 1999, “尼泊尔影响妇女工作量的因素, 性别和家庭粮食安全”,
www.ifad.org/gender/learning/role/worklod/24.htm

IFAD. 1999, “乡村贫困评估: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罗马, IFAD。

www.ifad.org/gender/learning/role/workload/in generation

Jackson, C. & Palmer-Jones, R., 1998, “工作强度、性别和福利”, 《UNRISD 性别、贫困和福利》, 讨论文章 96, 日内瓦,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Jayaweera, S., 1999, “斯里兰卡妇女”, 《国家简报》, 马尼拉, 亚洲开发银行。

Jieru, W., 1999, “中国西南部云南丽江县案例研究”, 选自 Jeannette D. Gurung (编辑) 《在印度克什喜马拉亚寻找妇女的声音, 加德满都, 山区开发一体化国际中心》。

Joekes, S., 1995, “巴基斯坦北部性别和生计”, IDS 通讯。发展研究所 26 (1).



参考文献

- Jordans, E. & Zwarteeven, M.**, 1997, 《她自己的水井: 孟加拉国灌溉项目的性别分析》, 孟加拉国, 国际灌溉管理研究所和Grameen Krishi基金会。
- Kanvinde, H.S.**, 1999, 《马尔代夫生物资源管理的性别作用》, RAP出版 1999/8, 曼谷, 粮农组织亚太地区办公室。
- King, E.M. & Alderman, H.**, 2001, “赋予妇女权利来获得粮食安全: 教育”, 《2020 焦点, 6》简报 12 之6。2001年8月, 华盛顿特区,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
- Korsieporn, A.P.**, 2000 11月, 《泰国由妇女调停的乡村 — 城市粮食系统联系》, 妇女发展项目开发的案例研究, FAO 亚太地区办公室。
- Laier, J.K., Davies, S. 等**, 1996, 《性别、家庭粮食安全和应对措施: 带注释的参考目录》, 布赖顿, 发展研究所: 119。
- Lechte.**, 1998, 引自UNDP/USRA在吉隆坡5月 6-8, 1998召开的关于亚太地区贫困相关核心数据需求的地区会议报告。
- M.S. Swaminathan 研究基金会**, 1999, 《作为生物资源管理者的斯里兰卡妇女和男人》, 曼谷, 粮农组织亚太地区办公室. RAP 出版199/45。
- Masika, R. & Joeke, S.**, 1997, 《可持续性环境开发与贫困: 一项性别分析》, 布赖顿, 发展研究所: 1-14。
- Matthews, R. & Nee, V.**, 2000, “中国乡村中性别不平等和经济增长”, 《社会科学研究》 29 (4), 第606-632页。
- Mehra, R.**, 1995, 《妇女、土地和可持续性发展》, 华盛顿特区, 国际妇女研究中心。
- Meinzen-Dick, R., Brown, L.B., Feldstein, H.S. & Quisumbing, A.R.**, 1997年5月, 《性别、产权、自然资源》, FCND讨论文章 No. 29, 华盛顿特区,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第二章

Meinzen-Dick, R. & Zwartveen, M., 1998, “不同性别在水管理中的参与：来自南亚水用户协会的问题和展示”，《农业与人的价值》15 (4)。

Menon-Sen, K. & Shiva Kumar, A. K., 2001, 《印度的妇女：自由程度？平等程度？》，来自联合国驻印度居民协调者的报告，新德里。

Mugniesyah, S.S.M., 2002, “乡村妇女在粮食安全中的角色和被赋予的权力：印度尼西亚例子”，《乡村妇女在粮食安全中的角色和被赋予的权力：研讨会论文集》，日本粮农组织协会，日本农林水产部，粮农组织。

Murray, U. & Kesone, S., 1998, 《老挝社会-经济和性别在农业中》，地方水产养殖发展项目，曼谷，粮农组织。

Nathan, D. 等, 1999, 《性别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和战略措施》，妇女发展论文，系列号 No. 5，曼谷，亚太经济和社会委员会。

国家样本调查组织, 1996, 《*Sarvekshana*》，第 XX 卷 No.1, 第 68 期, 7-9 月, 新德里, 规划和项目执行部。

Naved, R.T., 2000, 《现代农业技术传播对家庭内部的影响：从性别角度透视》，FCND讨论文章 No.85，华盛顿特区，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Niamer-Fuller, M., 1994。 “第三世界的妇女畜牧业管理者：技术焦点”。
www.ifad.org/gender/thematic/livestock/live_toc.htm

Ninno, del, C., Dorosh, P.S., Smith, L.C. & Roy, D.K., 2001, 《孟加拉国 1999 年洪水灾害影响，家庭应对措施和反映》，研究报告 122，华盛顿特区，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O'Brien, N., 2001, 《柬埔寨乡村社区中降低风险和灾害管理》，金边，CARE 国际柬埔寨代办处。

Pal, M.S., 2001, “孟加拉国妇女”，《ADB国家简讯》，马尼拉，亚洲开发银行。



参考文献

- Pinstrup-Andersen, P., Pandya-Lorch, R. & Rosegrant, M.W.**, 1999, “世界粮食前景: 21世纪前期的关键问题”, 《2020远景》, 粮食政策报告, 华盛顿特区,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 Quisumbing, A.R. & Otsuka, K.**, 2001, “父系社会中的土地继承和入学: 来自苏门答腊的证据”, 《世界发展》 29 (12)。
- Quisumbing, A.R., Brown, L.R. 等**, 1995, 《妇女: 粮食安全的钥匙》, IFPRI食物政策公告,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1-4。
- Rengalakshmi 等**, 2002, 《乡村和部落妇女在农业和生物多样化保护中: 一项印度案例研究》, Chennai, M.S. Swaminathan 研究基金会和曼谷, 粮农组织 亚太地区办公室, RAP出版 2002/08。
- Robinson, J.**, 2000, 《太平洋妇女呼吁她们在渔业中的作用被认可》, Tok Blong Pasifik 由加拿大太平洋人民的合作伙伴出版。
- 柬埔寨皇家政府, 2000, 《柬埔寨人力开发报告》, 金边, 计划部。
- Sachs, C.E.**, 1996, 《分性别的土地: 乡村妇女, 农业和环境》, 科罗拉多, 西景出版公司。
- Sawada, Y. & Lokshin, M.**, 2001, 《巴基斯坦乡村中的家庭入学决定》, 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
- Shatrii Shakti.**, 1995, 《妇女、发展和民主: 一项对尼泊尔妇女状况中的社会经济变化的研究 (1981-1993)》, 加德满都。
- Subrahmanian, R.**, 1997, “如果你建好了, 她们会来吗? 经济不稳定和社会风险背景中的教育决策”, 《IDS通报》 28。
- Tinker, I.E. & Summerfield, G. (编辑)**, 1999, 《妇女对房屋和土地的权力: 中国、老挝和越南》, 波尔德, Lynne Rienner 出版社。
- Thonguthai, P., Thomson, S. & Bhongsug, M.**, 1998, “泰国妇女”, 《国家简讯》, 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第二章

UNDP, 1999, 《太平洋人力开发报告》。

UNDP, 2001, 《人力开发报告2001》, “使新技术为人力开发工作”,
www.undp.org/hdr2001

UNDP, “关于粮食安全和农业的全球规划”,
www.undp.org/Seed/food/pages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 2002, “妇女地位委员会面前的理论问题”, 秘书
长报告, 纽约。

UNICEF, 1996,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儿童和他们的家庭: 一项现状分析》,
万象。

UNIFEM, 2001, 《蒙古妇女: 标志过渡时期的进步》, 纽约。

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DAW)和联合国妇女发展委员会, 2001, 《全球化背
景下乡村妇女的状况》, 专家小组会议报告, 纽约, DAW, 经济和社
会福利部。

联合国大会, 1999, 《对妇女在发展中作用的世界调查: 全球化、性别和工作》
, A/54/227, 联合国, 纽约。

世界银行, 2001, 《使性别进入发展》, 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 华盛顿特
区, 世界银行和牛津大学出版社。

世界银行, 2001, 《世界发展报告 2000/2001》, “向贫困进攻”,
www.worldbank.org/poverty/wdrpoverty/report/index.htm

世界银行, 2002, 《将性别融入世界银行的工作中: 行动措施》, 华盛顿特区。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01, 《WFP以工作换粮食项目中的决策》, 性别研究项
目, 工作报告3, 罗马。

Zeller, M., Sharma, M., Ahmed, A.U. & Rashid, S., 2001, 《孟加拉国针对乡
村穷人的以小组为基础的金融机构; 在机构和家庭水平上的分析》,
华盛顿特区, 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破土:
农业中妇女的现状及前景